**电子信息科学学院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资料（2020年4月）**

**目录**

1. 关于印发《中共福建江夏学院委员会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加强学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7日会议精神

三、习近平在宁德

四、习近平在厦门

         电子信息科学学院党政办公室编

**一、关于印发《中共福建江夏学院委员会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加强学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践意见》**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党对高效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提升学校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根据**《中国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有关党内法规和中组部、中共教育部党组**《高校党建工作重点任务》《关于高校党组织“对标争先”建设计划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现就适应新时代要求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1. **总体要求**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牢“**四个意识**”，鉴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学校党委领导核心作用，落买把方向过硬、管大局过硬、做决策过硬、保落实过硬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着力深化理论武装，着力夯实基层基础，着力推进正风肃纪，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进一步完善校党委、二级党组织、党支部、党小组、党员**“五级联创”**的长效机制，构建学校党委、二级党组织、党支部、党员**“四位一体”**的组织体系，巩固院系党建工作示范点建设的成果，全力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质量。

**（一）强化政治建设。**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持续开展大学习，大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进教材、进师生头脑。推动学校各级党组织和干部党员学习贯彻党章党规党纪，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学习和遵守党章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来抓，做到深学细照笃行。

**（二）突出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聚焦学校党的建设的存在问题，系统谋篇布局，精准施策发力，紧密围绕高校党委“四个过硬”，二级党组织“五个到位”，基层党支部“七个有力”要求，以标准化建设为牵引，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扩大组织覆盖，创新活动方式，增强党员队伍的生机活力，促进党建工作规范化、科学化，使党建工作体系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

**（三）引领事业发展。**坚持把典型引领作为重要推动力，围绕创建党建工作示范高校、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和支部“达标创星”活动，精心培育、总结凝练成熟机制、有效办法、典型经验，以党建品牌建设成果示范引领、辐射带动基层党建工作开展，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建设特色鲜明示范引领的应用型本科大学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1. **充分发挥二级党组织政治核心作业**

着力落实二级党组织领导和运行机制到位、政治把关作用到位、思想政治工作到位、基层组织制度执行到位和推动改革发展到位要求，优化二级学院运行机制，模范执行二级党组织会议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落实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提升师生思想政治工作质量，培育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做到机制健全、执行有力，使二级党组织成为教育和团结广大师生员工的政治核心。

**（一）强化班子建设。**各二级党组织书记应担起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职责，二级学院院长和班子其他成员应认真履行好“一岗双责”。班子成员工作职责明晰，运行顺畅，二级党组织会议、党政联席会议边界明确，决策议事规则清晰规范，执行到位。充分发挥二级党组织对党建工作的主导作用，有关干部任用、党员队伍建设等工作，由党组织会议研究决定。对重大事项的把关作用充分发挥，涉及办学方向、教师队伍建设、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等重大事项，

党组织先研究再提交党政联席会议决定。进一步完善重要议事决策的会前征求意见和会后执行反馈机制，着力提升工作效能。完善支部书记月例会制度，听取党支部工作情况，强化工作指导，解决实际问题。

**（二）强化政治把关。**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抓实**《福建省高校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工作要求，二级党组织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二级学院院长要认真履行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责任，党委副书记要认真履行直接责任人职责，及时了解掌握动态，加强舆情研判，敢于发声亮剑，引导党员、干部师生明辨是非、澄清模糊认识，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和负面言论。在教学科研管理等重大事项中，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在教师引进、课程建设、教材选用、学术活动、对外交流等重大问题上把好政治关。加强对学术组织、研究机构、学生社团等的引导，管好各类宣传思想文化阵地。二级党组织定期研究学术组织、研究机构、学生社团建设发展工作，每学期至少 1 次，并明确专门班子成员或党员干部联系指导开展工作。严格执行**“一会一报”“一事一报”**制度，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类报告会、研讨会、论坛等审批把关、指导管理。

**（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统筹推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认真落实**《中共福建江夏学院委员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实施意见》《中共福建江夏学院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辅导员队伍建设实施意见》《福建江夏学院“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建设方案》**等要求，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和践行，加强师德师风、教风学风建设。进一步健全学生党建工作组织领导机制，二级学院党组织对学生党建工作负主体责任，二级学院党组织书记负主要领导责任，副书记负直接领导责任。强化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开展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针对干部师生思想状况，及时有效加以引导。进一步落实**《福建江夏学院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和**《关于加强和改进学校党委中心组学习的意见》**，提高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质量效果，充分发挥领学促学作用。严格落实班子成员联系基层制度，建立干部联系师生党支部、教研室、班级、宿舍、社团长效机制，每周与师生“面对面”至少 1 次，定期调研分析党员和师生思想政治状况。坚持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制度，每学期为师生开设党课、思政课、形势与政策课至少 1 次。发挥分党校作用，加强师生理想信念教育。

**三、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着力落实党支部教育党员有力、管理党员有力、监督党员有力、组织师生有力、宣传师生有力、凝聚师生有力、服务师生有力要求，发挥党支部在政治引领、规范党的组织生活、团结凝聚师生、促进学校中心工作等方面的主体作用，以落实党支部工作条例为抓手，突出政治功能，扎实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全面激发基层党组织生机活力，使党支部成为师生最贴心、最信赖的组织依靠。

1. **优化党支部设置。**健全基层党组织，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按照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有利于人才培养、有利于直接联系服务师生的要求，合理设置基层党支部。积极探索依托重大项目组、课题组和学生公寓、社团组织、创新团队等建立师生党支部。

**（二）优选优配强党支部书记。**完善“双带头人”培养机制，全面实施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机关党支部书记原则上由部门党员主要负责人担任。注重从优秀辅导员、优秀学生党员中选拔学生党支部书记。建立党支部委员履职培训制度，新任党支部书记须在任职 6 个月内接受集中培训。落实建立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党支部书记典型选树机制，坚持以先进带中间、督后进。

**（三）提高组织生活质量。**严格执行党的组织生活制度，严格执行基层党组织按期换届规定，坚持开展每月 10 日的“党员活动日”、“党费交纳日”制度。加强对“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等工作的具体谋划，立足中心任务、重点工作和党员群众需求，贴近师生党员的思想、工作、生活实际，确定党日活动主题，其中每年至少开展一次与党风廉政建设主题相关的党日活动，切实做到找准着力点、提高针对性、扩大参与面，不断增强党支部凝聚力。从严从实抓好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广泛开展谈心谈话，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抓实查摆问题的整改落实，切实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领导干部带头过好双重组织生活。

**（四）做好发展党员工作。**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员发展工作细则》**，做到有计划、有检查、有落实。坚持党员发展标准，严格党员发展程序，注重政治合格，端正师生入党动机。教师党支部积极团结凝聚高层次人才、优秀青年教师、海外留学归国教师，建立入党申请人、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培育梯队，符合条件的及时吸收入党，班子成员原则上应联系 1 名优秀教师，协助做好发展党员工作。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预备党员、新转正党员的教育培养，严把“质量关”，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学生入党。学校各级党组织应把发展党员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每学期至少研究 1 次，并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作为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和党务公开的重要内容。

1. **充分发挥党小组前沿阵地作用**

着力落实教育规范、监督规范、服务规范要求，发挥党小组教育、管理、监督、服务作用，保证支部党员大会决议的贯彻执行，推动党支部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不断提升基层党支部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

**（一）规范党小组设置。**人数超过 10 人的党支部，一般应成立党小组。应充分考虑师生党员特点，按照便于组织开展活动原则，把党小组设置到专业上，设置到宿舍中，设置到社团里。党支部每年至少研究 1 次党小组设置，根据党员结构变化和支部工作需要及时建立或调整党小组，及时选派优秀正式党员担任党小组组长。新进入党支部的党员，应及时编入一个党小组参加学习。

**（二）落实党小组管理监督。**党支部委员每人联系 1 个党小组，指导开展活动，党小组组长每月定期向支委会汇报党小组工作、学习和活动开展等情况，支委会应将研究党小组工作情况纳入每月会议的议事日程，提出指导意见。领导干部应主动参加党小组活动，将其作为过好双重组织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协助开展日常管理监督。在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上，应听取党小组组长述职并开展评议，接受师生党员监督。

**（三）创新党小组活动方式。**党支部应聚焦示范引领，积极搭建典型带动平台，根据各党小组的人员构成、工作情况，分类设定党小组年度、学期工作目标，设计党支部“立项活动”党小组“子项目”，围绕中心任务、重点工作和服务师生群众需要，充分发挥党小组功能，积极开展形式灵活、贴近实际的学习教育和工作实践活动。探索在学生党小组中设立教师党员辅导岗、先锋岗的做法，协助党支部指导学生党小组活动，促进党小组规范化运行。

**五、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着力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统一，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向着理想信念高标准努力，同时以党的纪律为尺子，使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努力实现师生党员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

**（一）加强党员教育。**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加强政治理论教育，突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组织党员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基本知识，引导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突出政治教育和政治训练，强化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和党的宗旨教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注重知识技能教育，帮助党员提高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落实好党员每年集中学习培训，时间一般不少于 32 学时。基层党组织应注重分

析党员思想状况和心理状态，党组织负责人应经常同党员谈心谈话，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二）规范党员管理。**通过佩戴党员徽章、创建党员先锋岗、承诺栏、党员责任区，开展设岗定责、承诺践诺等措施，完善重温入党誓词、入党志愿书以及党员过“政治生日”等政治仪式，引导党员增强党员意识、发挥主体作用，做好本职工作，做到在联系服务群众、完成重大任务中勇于担当作为。加强对流动党员管理，对外出 6 个月以上并且没有转移组织关系的流动党员，应保持经常联系，跟进做好教育培训、管理服务等工作。重视对毕业生流动党员、出国（境）学习研究党员的组织关系接转和管理工作。

**（三）强化党员监督。**党组织应通过严格组织生活、听取群众意见、检查党员工作等多种方式，监督党员遵守党章党规党纪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情况，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情况，参加组织生活情况，履行党员义务、联系服务群众、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情况。发现党员有思想、工作、生活、作风和纪律方面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以及群众对其有不良反映的，党组织负责人应及时进行提醒谈话，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四）创新分类指导。**党组织应围绕“四个合格”要求，加强对党员的分类指导。教师党员带头肩负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应努力成为“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和“四个相统一”的表率。学生党员应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者，朋辈帮扶、互助友爱的践行者，就业创业、志愿服务国家需要的争先者，钻研科学知识、永攀科学高峰的探索者。机关和管理服务岗位党员应牢固树立为师生服务的理念，紧密联系师生，与师生开展定期面对面交流，持续提高机关效能，落实“马上就办”，做到走在前列、干在实处。

**（五）发挥离退休党员作用。**完善离退休党员党组织设置，组织离退休党员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推动老党员在党建工作、思政工作、关心关爱学生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针对老党员的身体、居住和家庭等实际情况，采取灵活方式，进行教育管理服务，对年老体弱、行动不便、身患重病甚至失能的党员，组织活动和开展学习教育不作硬性要求，党组织通过送学上门、走访慰问等方式，给予更多关心照顾。

**六、加强组织领导**

**（一）层层抓实责任。**选齐配强二级学院专职副书记、专职组织员、辅导员等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骨干；进一步完善部门党员正职担任支部书记，副职担任纪检委员的有效机制；持续实施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着力落实校院两级党委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提升学校各级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工作全覆盖成果，抓实党支部书记向二级党组织述职，二级党组织书记向学校党委述职的工作质量，考核结果作为评先评优、

干部选用的重要依据，努力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局面。

**（二）完善激励机制。**做好“优秀共产党员” 、 “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评优表彰奖励工作，进一步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荣誉感、归属感、使命感。对于在学校改革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干部，优先安排培训进修、轮岗交流、挂职锻炼，优先考虑提拔使用。落实专任教师兼任党务工作补助绩效制度，把党支部书记等党务工作经历作为选拔任用党政干部的重要条件，作为专业技术职务评定的重要参考，不断探索完善干部正向激励机制，有力提振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精气神。

**（三）加强阵地保障。**围绕阵地建设要求，统筹资源和力量，完善机构，配强人员，搭建平台，强化培训，加大经费投入，将基层党建工作经费纳入年度预算，进一步完善二级党组织党建经费拨款机制，加强对基层党组织特色品牌项目建设经费支持，加强对党建楼栋、党建教室、党员活动室、党建信息化建设等的持续投入，做到各教学楼、各宿舍楼栋均有样板党员活动室、支部活动室。每个二级学院应当建立至少 2 个样板党支部活动室，配齐必要设备，一般面积不小于25 平方米。

**（四）加大宣传力度。**将宣传工作贯穿基层组织建设全过程，充分借助各类媒体、统筹校内外宣传资源、用好网上网下宣传平台，以接地气、形象化的方式，多形式、多渠道宣传展示学校基层党建先进组织、先进个人、优秀成果和典型案例。着眼于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高校党建理论前沿问题和新建本科高校党建工作特色特点，大力推进党建课题研究，享受科研课题同等待遇。切实树立起大抓基层、严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形成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为

提升高校党建质量营造良好工作氛围和舆论环境。

1.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7日会议精神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7日召开会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研究部署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当前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疫情防控工作和当前经济形势的汇报，研究当前疫情防控和经济工作，决定将有关意见提请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但保持疫情防控成果、防止疫情反弹的任务繁重，必须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防控成绩，巩固防控战果，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因时因势完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措施并切实抓好落实，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做好必要防护，不断巩固疫情持续向好形势，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提供有力保障。

会议强调，湖北省和武汉市要继续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精心治疗、悉心护理重症患者，抓实社区防控，压实企事业单位防控责任，对重点人群实行核酸检测应检尽检、对其他人群实行愿检尽检。其他地区要动态调整离汉人员管理和健康监测规定，同湖北省和武汉市互通互认核酸检测、隔离观察等方面信息。要加强对湖北省和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保障的政策支持，帮助群众解决就业、收入、就学等方面的实际困难。要继续加强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各地要精准抓好内防反弹工作，对新增本土确诊病例要加强流行病学调查，及时发现其中暴露出的防控问题，加固薄弱环节、补上短板漏洞。

会议要求，加强和完善外防输入举措，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要继续加强对境外我国公民的关心关爱，驻外使领馆要做好领事保护和防护指导，发挥好侨团、留学生会等作用。要坚决守住守好口岸城市防线，优化医疗资源和救治力量布局，加强检疫检测能力建设。要加强集中隔离人员安全服务保障，做好健康监测和人文关怀。要深入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同世界卫生组织深化交流合作，继续向有关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以多种方式为国际防疫合作贡献力量。

会议指出，今年一季度极不寻常，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众志成城、顽强拼搏，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经济社会运行逐步趋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我国经济展现出巨大韧性，复工复产正在逐步接近或达到正常水平，应对疫情催生并推动了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

会议强调，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必须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切实增强紧迫感，抓实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大“六稳”工作力度，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是大局，必须确保疫情不反弹，稳住经济基本盘，兜住民生底线。要在稳的基础上积极进取，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全面推进复工复产达产，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培育壮大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会议指出，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把资金用到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上。

会议强调，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要释放消费潜力，做好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扩大居民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要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要支持企业出口转内销。要着力帮扶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加快落实各项政策，推进减税降费，降低融资成本和房屋租金，提高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能力。要保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促进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达产。要切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加大脱贫攻坚力度，复工复产中优先使用贫困地区劳动力，确保如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要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就业工作，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要完善社会保障，做好低保工作，及时发放价格临时补贴，确保群众基本生活。我国粮食安全有充分保障，要抓好农业生产和重要副食品保供稳价，夯实农业基础。要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会议指出，要不失时机推动改革，善于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要坚定扩大对外开放，保障国际物流畅通，严把防疫物资出口质量关，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三、习近平在宁德**

## **“习书记在宁德提出的观点和思路放到现在**

## **都是非常恰当和深刻的”**

### —— 习近平在宁德（一）

采访对象：吕居永，1926年生，山西泽州人。历任宁德地区福安县委书记、寿宁县委书记、古田县委书记、连江县委书记，1980年任地委副书记、副专员，1983年任地委书记，1988年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兼农经委主任。1993年12月退休。

　　采 访 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政

　　采访日期：2017年6月2日

　　采访地点：福建省老干局干休所

****采访组：吕老您好！您是我们这次在福建采访的同志中最年长的一位，习近平同志当年是从您那里接任宁德地委书记的，能够听您讲他当年在宁德工作的事情，我们感到很荣幸。请您先讲讲当年交接的情况。****

****吕居永：****1988年3月，我在福州参加省里的两会，省委书记陈光毅同志找我谈话，说省委想让习近平同志到宁德接我的班，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早已过了任职年龄，有年轻人来接替我，我当然很高兴。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当常务副市长，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我知道他是习仲勋同志的儿子，各方面反映很不错，我就和陈书记说：“习近平同志到宁德最合适了。因为宁德是革命老区，他是老革命的后代，所以他对老区肯定有很深的感情。他到宁德去，我完全赞同。”

　　于是，省委在两会上就把这个事情定下来了。两会结束后，省委任命我到省人大当常委兼农村经济委员会主任，在福州还有很多事要处理，我就没有马上回宁德。习书记一到宁德上任，也直接下去调研了，所以我们一直没见上面。6月，我从省里回到宁德，想和他当面交接一下，那天他正好不在机关，正在周宁县搞调研。我就跑去周宁县，在当地的招待所和他见面了。

****采访组：当时您和习近平同志交接了哪些内容？****

****吕居永：****我主要向他简单介绍了宁德的区情、社情和经济发展情况，给他讲了一个多小时，习书记听得很认真，一直没有插话。我讲到最后，对习书记说：“闽东人民很欢迎你到闽东来工作。”他当时讲了两句话：“你们在闽东工作了将近40年，很艰苦，也很光荣。我是来向闽东老区人民学习的。”之后，我还要到政和县去调研，我们也没顾得上一起吃中午饭，就告别对方各自忙起来了。后来我听说，习书记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跑遍了闽东9个县，相信在他的脑海中已经勾勒出了闽东发展的一个框架。群众都反映，别的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个新书记来了“不烧火”，而是在山里面转了一大圈，调研工作做得扎实，做得深入。

　　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习书记根据自己一个多月的调研实践，总结出宁德的三个“三”，就是三大特点、三大弱点、三大优势。三大特点包括：一是革命老区，9个县都是重点的革命老区；二是少数民族畲族的聚集区，全国的畲族集中在福建，福建的畲族集中在闽东；三是贫困，宁德是全省最贫困的地区，也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所以被称为“老、少、边、岛、穷”，占全了。

　　宁德还有三大弱点。第一个弱点是交通闭塞。那时候福州到宁德之间只有一条福安公路，全程要走4个小时。宁德内部交通条件也不好，到福安要走眉洋岭，到周宁要经过油岭、愁岭，到寿宁要经过车岭。第二个弱点是没煤少电。当时宁德只有一个小型水电站，没有水库，只能靠河流发电，丰水期有电，枯水期就没电，发电基本靠天。第三个弱点是群众思想观念陈旧。大多数人认为种田是为了吃饱肚子，养猪是为了过年，养鸡是为了买油盐，小农经济思想严重。

　　宁德也有三大优势：第一个是政治优势，就是我刚才讲的，有老区这个光荣传统；第二个是山海资源优势；第三个是宁德劳动人民的淳朴风气和艰苦奋斗精神，形成了一种人的优势。

　　他在宁德工作期间，紧紧抓住了闽东的三大特点，着眼于克服三大弱点，努力去发挥三大优势，给闽东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采访组：您对习近平同志有哪些深刻印象？****

****吕居永：****虽然在宁德期间，我和习书记没有工作交集，但他非常尊重老同志，这种尊重不是挂在嘴上讲的，而是体现在实际工作的方方面面。

　　首先，体现在用车上。当时和习书记一起新上任的有四个人，一个是习书记，另外有两个是地区副专员，还有一个是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为此买了两辆新车。习书记作为新来的地委一把手，挑一辆新车做专车一点不为过。可他不要，一定还要坐我原来那辆旧车。我那个车出过一次事故，大修过，按理讲是不安全的。可他坚持不换，司机也还用我原来那个。我感到，这是对我这个老书记的一种尊重。第二，他接任我以后，还是用我原来那间办公室，他也不换，更没有装修。第三，我清晰地记得，1988年11月27日，宁德地区召开了一个三级干部扩大会，地县乡镇的领导干部都来了，规模比较大。习书记专门邀请我去参加，还要我在这个会议上讲话。我当时想，我已经退下来了，而且前面几个书记、专员都就具体工作讲得很全面了，我参加一下就行了。可他很坚持，说：“你是老前辈，是长者，一定要讲一下。”为了不同之前那几位领导讲的内容重复，我讲了关于林业工作的一些情况。我说闽东在经济上与其他地区存在差距，林业上的差距更大，这个问题我自己有责任。因为我在闽东工作39年，闽东大部分的山还都是光头山，幼林多，小林多，稀林多，树枝打的多（是指把树杈都砍掉，只剩下一个头），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大跃进”时搞大炼钢铁，把树都砍没了。我们在森林问题上欠了债，如果再不重视，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我还结合之前习书记他们讲的内容，提出了三个要解决的问题：一是认识问题，二是政策问题，三是领导问题。

　　当时我讲这些话都是即兴的，有感而发的，没有稿子，本以为讲完就完了。结果会议结束以后，习书记让地委办公室的同志把我的讲话整理出来，还印成文件发下去，让各单位学习，令我非常感动。

****采访组：后来习近平同志先后调到福州和省委工作，你们同在福州，您和他还有工作和生活上的交往吗？****

****吕居永：****习书记回到省委当副书记以后，我们工作上的接触和交流就多了起来。那时候我已经从人大退下来，到老区建设促进会工作，他当时正好分管我们这个促进会，所以我们经常联系。他很看重我在闽东工作几十年的经历，每次到闽东调研都要叫我跟他一起去看看，看完还很认真地听取我的意见建议，前后大概四五次吧。他下去调研从来不坐小车，都是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坐中巴，随行的除了秘书长李育兴同志，还有一些涉及农村工作的厅局长。

　　有两次让我印象深刻。有一次是我陪他到福安县徐家塘村，台风来了以后，海水把塘体冲垮了，全村七八十户人家都受了灾。习书记冒着台风再起的危险，到村里去看望农户，不停地嘘寒问暖。还有一次，我们到上洋村和半屿村，这两个村的塘体也被洪水冲垮了。习书记知道以后，要求当地尽快把塘体修复，把3000多亩地保护起来，并提出在这片地上建一个工业区，既保护了土地，又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通过这两件小事，我感觉习书记这个人，对人民群众有情怀，对工作又很有想法。

　　生活上，我感到习书记是一个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非常严格的人。我讲一件亲身经历的故事。大概是1988年，我和老伴儿从福州回宁德探亲，当时我在人大农经委也给配了车，我们两个人就开着车回去了。习书记的爱人彭丽媛刚好请假也在宁德。我听说彭丽媛去宁德的时候，习书记没有用自己的车去接她，是让她坐班车过去的。等到要回来的时候，他知道我也要从宁德回福州，就问我：“你什么时候回去？”我说第二天就回去。他问我：“回去都什么人坐你的车？”我说就我和老伴儿两个人。他说：“彭丽媛要回去了，顺路搭你那个车好不好？”我说当然可以。我心想，他作为地委书记，爱人难得过来探望他，他派自己的车专门接送一下，再正常不过了。可他却没有，从不占公家一点便宜。他这种以身作则的作风让我很敬佩。

　　还有一次，我和老伴儿回宁德过中秋节。当时地委有几个同志家属不在身边，习书记是其中一个。我老伴儿说，把他们几个叫过来吧，咱们一起包饺子吃。习书记一听，很高兴地就答应了。吃饭的时候我老伴儿发现他头发很长，就情不自禁地说：“习书记你这头发太长了，怎么也没去理一下。”习书记憨憨地说：“您知道到哪里去理发吗？”我老伴儿就把宁德一个我们经常去剪发的老师傅地址告诉他了。我们都没想到，他每天忙于工作，竟然连剪头发的时间都没有。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以后和您还有交往吗？****

****吕居永：****2010年的时候，习书记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他到厦门开会，路过福州，提出要到宁德去一下，并专门通知我和其他两个同志一起到宁德去跟他见面，还拍了照片。2014年底，习书记到龙岩市古田县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后又回到省里参加各种会议，非常忙碌，最后也没能和我们这些故交见上一面。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习书记从福建临走时，特意交待省委办公厅，他说：“请跟老同志们讲一下，这次我实在没有时间和他们见面，请代我转达对他们的问候。”大国领袖，行至于此，令人动容。

****采访组：听您讲了这些，我们也感到习近平同志对宁德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和对共事过的同志们的情谊。****

****吕居永：****我感觉，习书记这个人有几个特点：第一，知识面很广。古今中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军事都很了解，什么都懂。第二，思维能力很强。他提出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既是他个人从政生涯的深刻体会，也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树立的科学思维方式。第三，作风扎实。他这个人只讲实的，不讲虚的。他跟我们讲过，讲话要讲四种话：讲真话、讲实话、讲短话、讲对群众有用的话，而不要去讲那些大话空话，更不要讲假话。第四，生活朴素。我刚才讲了一些他到宁德生活简朴、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严格的例子，这些情况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听说你们要来采访我，我认真回想了当年习书记在宁德施政提出的那些观点和思路，放到现在都是非常恰当和深刻的。比如，他说宁德的扶贫工作“快不得也慢不得”，所以他紧紧抓住了闽东的三大特点，着眼于克服三大弱点，努力去发挥三大优势，既讲“弱鸟先飞”，又讲“滴水穿石”，这两者与“四下基层”一起构成他在三个层面上对闽东发展的思路。“弱鸟先飞”，就是要正确认识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充分发扬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集区的“闽东之光”，发扬闽东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意志，走一条适合本地发展的“先飞之路”“快飞之路”；“滴水穿石”，就是要拿出百倍的信心、耐心、恒心，树立长远规划，一任接着一任干。他还提出“扶贫先扶志”，先摆脱“思想贫困”，再摆脱“经济贫困”。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理念和观点。

　　可以说，习书记在宁德工作那两年，在思想、作风、精神等各个方面，都为宁德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尤其是在思想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带领山沟沟里的闽东人抬眼观察和拥抱外面的世界。记得2010年相聚的时候，他很高兴地对地委班子说：“过去我说，宁德不能指望一下子抱个‘金娃娃’。这些年，一任接着一任干，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都通了，三都澳也开发了，闽东人的愿望实现了，‘金娃娃’不也就抱上了吗？”

　　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他超群的治国理政思想和指导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赢得了党心，赢得了民心，赢得了军心，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现在也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最强大的时期。这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赢得了20多次掌声，赢得了来自世界的普遍赞誉。如果要问他赢得这份尊重最终根源在哪里？我想还是因为他赢得了人心。人心就是群众，就是他自始至终牵挂不已的人民。

## **“习书记主政宁德时就展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

### ——习近平在宁德（二）

采访对象：李育兴，1943年11月生，福州市人。先后担任福安县委书记、宁德地委委员兼秘书长、福建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办公厅主任。

采 访 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

　　采访日期：2017年6月8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李主任您好！您和习近平同志先后在宁德和省里共事的时间比较长，请您介绍一下大概的情况。****

****李育兴：****从习书记1988年6月来宁德到他2002年10月离开福建，15年间我以不同身份在他领导下开展工作，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88年6月到1989年12月，我当时是宁德地区福安县委书记。第二阶段是1989年12月到1990年5月他离开宁德去福州前，我是地委秘书长、地委委员。第三个阶段是1996年3月到1998年5月，他任省委专职副书记，按照福建省委办公厅的惯例，一个副书记配一个副秘书长，因为我在宁德当过他的秘书长，所以就让我来当他的副秘书长。1998年3月，我任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继续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1998年5月。那之后，虽然不再一对一为他服务，但他还是省委办公厅服务的重要领导。第四个阶段是从1999年8月到2002年10月。在此期间他从省委副书记升任省长，我作为省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因工作关系，与他仍有较多联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1988年到宁德任地委书记，请您介绍一下当时宁德的大致情况。****

****李育兴：****当时宁德比较落后，是全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9个县之中有6个是贫困县。我国沿海地区都比较开放，经济比较发达，只有宁德不是，所以又被称为“沿海地区黄金地段的断裂层”。原因有两个：一是地理条件不好，山多田少；二是交通不便，只有一条104国道，虽然有很好的港口如三都澳、赛岐港，但没有对外开放。

　　习书记刚到宁德时，我感觉他少年老成，年纪不大，但非常稳重成熟、平易近人，不论面对领导干部还是基层群众，他都非常热情真诚。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福安是习近平同志当时的挂钩点。他是如何指导福安经济社会发展的？****

****李育兴：****当时福安县的经济和地位都比较特殊，它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宁德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

　　福安县是习书记的挂钩点，这既是历史的机缘，也有其必然性。一是福安的历史地位比较重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有八大革命根据地，闽东苏区是其中之一，而闽东苏区的首府就在福安县柏柱洋村。解放后，福安是专区，专员公署就驻福安县，后来迁驻宁德县，1971年改名宁德地区。二是福安的地理环境特殊。福安有山有水，山海兼备，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海阔岸长湾多港好”。赛岐港在解放前被称为“小上海”，经济比较发达。福安还是闽东的水陆交通枢纽，104国道贯穿福安。三是社会特点很突出。福安的社会特点是老、少、边、岛、贫、教（宗教），这也是闽东的特点。把福安作为挂钩点，对于指导整个闽东的工作具有示范作用。习书记在福安县有3个联系点：坂中畲族乡是民族乡联系点，社口乡坦洋村是党建联系点，赛岐铁合金厂是企业党建联系点。

　　习书记指导与推动福安工作，首先是推动福安县经济社会发展思路的转变。过去闽东比较落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闽东没有一个经济中心，也就谈不上经济中心的辐射影响作用。当时宁德有三大热门话题，一是开发三都澳港口，二是修建福温铁路，三是建设中心城市。这三个话题其实和福安县都有关系，因为赛岐港出去就是三都澳，福温铁路也通过福安县，尤其是建设中心城市，当时考虑最多的就是福安的赛岐港。这个想法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了，也经过几次论证，主要考虑到赛岐港地处闽东的中心，是水陆交通的要道，已经是物资的集散地，还有一些重点企业在那里。1987年8月，福安县召开了一个赛岐港中心城市研讨会，编制了赛江新城远景总体规划，还请南京设计院规划师来搞设计。1988年5月，赛岐经济开发区已经批下来了，省计委、建委等部门都很支持赛岐经济开发区的建设。

　　习书记一到闽东就立刻沉下去调研，大概一个月时间，跑了9个县区、13个乡镇、18个村、12家工厂电站及学校。深入调研之后，他说：“闽东有这三个话题是好事，表明闽东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有了提高，让外界认识这三件事的意义是必要的。但我们的立足点不能放在这上面，可能性和必要性不等于就是必然性。事关地区发展战略全局的决策，要充分考虑到国情省情区情，不要把近期内难以实现的发展目标超前化。当前重要的是抓好中短期的工作。”他还强调：“闽东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关键在农业、工业这两个轮子怎么转，我们穷在‘农’上，也只能富在‘农’上。”他深入调研之后，对闽东发展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感到这三个愿望是闽东的长期工作，现在搞不现实，“一夜暴富”的思想也行不通。

　　面对福安县的发展思路问题，习书记作出了深刻思考。1988年10月4日，习书记在赛岐镇主持召开赛岐经济开发区现场办公会，会上他认真听取开发区包括中心城市的规划情况以及历史上的来龙去脉等汇报，并做出指示。根据习书记的多次讲话精神，福安县委县政府制定了“东西两个口、南北一条线、三点一线带全县”的区域发展战略。“东西两个口”，即东面是赛岐，西面是穆阳；“南北一条线”，就是104国道；“三点”就是赛岐、穆阳和韩阳镇。提出了“从打基础抓起、建基地上见成效、立支柱上突破、抓两通上搞活、重软件上取胜”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出处理好“五个关系、五个同步”，即处理好治理整顿与改革开放、治理整顿与经济发展、治理整顿与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这五个关系。以后的实践证明，福安县的区域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这些措施都有力推动了福安县“两个文明”建设发展。

　　习书记十分重视和支持赛岐经济开发区建设。他在赛岐经济开发区现场办公会上，肯定了开发区发展的指导思想，并进一步就实施原则、开发步骤提出意见，还现场解决了很多问题。当时办公会确定了两件事：一是把开发区建设列入地委行署的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二是调整充实地区协调指导小组，涵盖地委行署主要部门、主要领导，体现了地委行署对开发区的重视。习书记还帮助开发区解决了几个重要问题，比如给开发区第一期建设用地400亩，这在当时是很难批的；帮助解决建设经费、外来落户户籍指标等。落户指标主要用来吸引外地人到赛岐参与开发建设。我们好几次到浙江去联系招商引资，把那边的企业家能人引到赛岐来，这就需要落户指标。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是如何关心指导福安其他工作的？****

****李育兴：****我主要介绍一下习书记对福安老区工作、少数民族工作、宗教工作等的关心和指导。

　　1988年7月，习书记刚到闽东两个月，就轻车简从去了福安两个地方。一个是甘棠镇观礼基点村，革命时期这里曾是安德县苏维埃政府和中共安德县委所在地，从1934年到1938年4年间，先后有八任县委书记为革命壮烈牺牲。另一个是溪柄镇柏柱洋斗面村，这里曾经是闽东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工农武装组织的诞生地，也是闽东独立师的发源地。习书记一来就走村入户看望慰问“五老”（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接头户、老交通员、老苏区干部），在斗面村还讲了话。习书记在宁德工作两年期间，经常到老区、基点村（即革命基点村，是指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位于国民党反动力量统治薄弱地区的边远山区农村，村民曾在共产党领导下斗地霸、惩腐恶、抗捐税、分田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和巨大牺牲）调查研究，时刻不忘曾为革命、为祖国流血牺牲的老区人民。

　　另外，宁德是福建省民族工作的重点地区，畲族一共有16万多人，占全国畲族人口的40%，占全省畲族人口的70%。福安县畲族人口有5.75万，占全县人口11.6%左右，是全国畲族人口最集中的县。福安县本身所辖22个乡镇，其中有19个都有畲族分布，而纯畲族的村庄有721个（包括自然村）。习书记刚来宁德工作时就强调民族工作的重要性。1989年1月17日，他在地区民委第七次委员会议上作重要讲话。《摆脱贫困》一书中，好几篇文章谈到畲族的经济、畲族村的工作情况。习书记还把福安县坂中畲族乡作为他的民族乡联系点，经常深入下去调研。

　　我讲一个事例。1989年初，他到坂中乡大林村调研，村口有一个大林小学。这个小学是一间只有两个小窗户的土坯房，全校4个年级47个学生就只有这一间教室、一个老师，所以每次一个年级只能上十分钟课。习书记看了心情很沉重，回去以后马上委托宁德军分区政委赵文法为大林小学送去了各种生活学习用品，包括书包、铅笔盒、铅笔以及衣服等。后来习书记还给大林村筹措了专项资金，建了一个两层楼四间教室的新学校，实实在在为畲族村教育做了件大好事。习书记就是这样一个人，一边调研一边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而且狠抓落实。

　　还有就是宗教工作。宁德是福建省宗教工作的重点地区，整个地区有1440多座寺观教堂，宗教徒15万人左右，是全国天主教地下势力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也是当时新建乱建寺庙教堂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福安又是天主教工作的重点县，全县有10个宗教工作重点乡镇，有34个开放的天主教堂口，整个地区信教群众多、分布广，情况比较复杂。在充分调研基础上，1989年10月31日，习书记在福安主持召开宗教工作座谈会，首先听取福安县近一两年宗教工作情况的汇报，对当时天主教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作了全面分析，并就加强天主教工作提出重要意见。习书记强调：“要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要保护合法、正常的宗教活动，限制和取缔非法的宗教活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为什么能够对福安进行那样具体的指导呢？****

****李育兴：****习书记之所以能够对福安的工作进行具体指导，主要是他在福安进行了深入扎实的调研。他担任宁德地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期间，经常到福安调研，我能回忆出的就有以下这些：1988年7月，先后到甘棠镇观里基点村、畲族人口占60%的洋畲村、连家船民最多的甘坪村，还有溪柄镇柏柱洋斗面村调研。1988年10月3日到5日，习书记陪同时任省委书记陈光毅到福安县调研赛江沿岸的绿竹带和坂中乡民族实验小学等。1988年11月，到坂中乡民族实验小学调研。1988年至1990年5月，4次到社口乡坦洋村调研。1989年初到坂中乡大林村调研，还有1989年1月1日到2日陪同时任省长王兆国到福安调研。1988年7月到1990年5月，他先后3次到范坑乡调研，其中两次去了毛家坪特困村。范坑乡是宁德4个特困乡之一，而且是福安最北边的地方，毛家坪特困村又特别贫困，有一次还是冒雨在那里调研。1989年11月到上白石镇不老村调研。1996年8月6日，到赛岐镇泥湾村、湾坞乡徐江村指导抗灾与重建家园工作。1997年6月6日到上白石镇郑家山村调研闽东脱贫致富奔小康。这次调研，他给郑家山村题词“积极探索山乡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新路子，赠郑家山党支部”，并在这次闽东调研中提出：“要把解决群众的脱贫安居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做到真扶贫、扶真贫。”1996年6月，到福安畲族经济开发区、康厝畲族乡东山畲村调研。

****采访组：请您谈谈福安县当时都有哪些具体变化。****

****李育兴：****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大力发展经济，即“打基础、建基地、立支柱、重软件”。打基础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投资环境，比如1988年6月动工建设赛岐大桥，1990年10月1号通车；建设甘棠22万伏变电站；建设下白石三千吨级杂货码头；建设罗江万吨自来水厂；安装4千门程控电话；完成湾坞6千亩围垦工程等。“建基地”是在农业上抓了“八个基地”建设，有黑荆树、绿竹、茶叶、水果、水产等项目，形成规模效益。“立支柱”主要是抓好食品工业“五条龙”，将韩阳镇的电机电器进一步成龙配套，抓好赛岐镇的打火机专业化和社会化生产。“重软件”就是制定了各种政策以及“三来一补”等优惠政策。

　　二是加强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习书记到宁德后，很重视抓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当时福安县正对县里的机构进行“消肿减肥”，全县撤销合并非常设机构47个，增强职能部门的效能。根据“四化”条件调整班子，调整了10名正局级及20名副局级干部。在廉政建设方面，遵照地委和习书记指示，清理干部职工违法违纪占地建房4000多户，罚款87.3万元，清退县直机关干部有私房占公房295户、747间，还收回长期拖欠公款159万。

　　三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好事。我前面讲到，习书记很重视教育，身体力行。为了解决当时福安教育上的困难，我们筹措了1000多万资金，用其中100多万为福安一中建了一座教学大楼，还对全县228所小学进行改造新建工作。

　　四是重视联系点建设。在习书记的关心和重视下，他的3个联系点都成为1990年宁德地委工作会议上的先进典型：坂中乡作“畲族之变在于加强村组织建设”的介绍；社口乡坦洋村作“坦洋上富路，党建下功夫”的介绍；赛岐铁合金厂作“发挥整体政治优势，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介绍，反响都很好。

　　应该说，当时福安县在党的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变化，都是与宁德地委行署的正确领导特别是习书记的关心指导分不开的，同时也是福安人民发扬习书记倡导的“滴水穿石”精神、老区精神、艰苦创业精神的结果，是福安人民增强“弱鸟先飞”意识、解放思想、敢为天下先、勇于开拓的结果。这些，正是习书记所期望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任期间，对宁德的绿色生态建设有哪些重要论述？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

****李育兴：****那时候的闽东，森林覆盖率与绿化程度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森林砍得多造得少，森林赤字多达30万立方米。还有340多万亩宜林荒山尚未绿化，近50万亩林地尚未改造。但因为当时人们温饱问题还未彻底解决，所以不少人的生态意识还不强。可习书记却十分具有前瞻性，他在1990年4月发表的《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一文中强调：“要注重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把农业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有的地方开创‘绿色工程’，这就是一条好经验。所谓‘绿色工程’，就是依托荒山、荒地、荒滩，发展开发性立体种植业，实行集约经营，专业协作。”

　　1989年1月，他在《闽东的振兴在于“林”——试谈闽东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在闽东这样一个贫困地区，山林资源是一个重要的优势。”“什么时候闽东的山都绿了，什么时候闽东就富裕了。”他还指出：“林业有很高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比如森林能够美化环境，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实现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等。从特殊的意义上理解，发展林业是闽东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

　　在习书记提出的明确指导思想下，闽东开始绘制一幅林业振兴的蓝图，就是苦战7年，确保1995年实现荒山绿化任务。他还要求稳妥扎实抓好完善林业责任制和健全林业经营机制。如今，闽东的荒山已经遍植绿树，绿色工程惠及千家万户。抬头看看漫山遍野的青翠，就总是能想起当年习书记满怀信心的寄语。

****采访组：从您亲身经历来讲，习近平同志还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发展思路和举措？****

****李育兴：****习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这么三条。

　　一是树立先进典型，以其示范作用来推动全局工作。1989年2月23日，习书记把8位农民请到宁德，给地区机关副科级以上干部介绍经验。他亲自主持报告会，逐个进行点评，肯定这8位农民的做法和经验并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地委工作会议上，搞了一个典型材料汇编《滴水集》，里面涵盖了71个典型人物和先进集体。习书记亲自为《滴水集》写序，讲了这样几层意思：首先是滴水可穿石。他写道，“改革开放这十年，闽东的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成就和变化是来之不易的，是闽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辛勤工作的结果，它凝聚着广大群众干部的心血，体现着滴水穿石的精神。”再就是滴水能够映出太阳的光辉。他写道，“在获取成就和推动变化的过程中，闽东人民的先进分子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当中，有靠勤劳起家、科技致富的新型农民；有精明开拓、活跃在商品经济舞台上的企业家；有辛勤耕耘、几十年如一日的山村女教师；有把穷山沟引上致富路，树立了党的光辉形象的‘战斗堡垒’等等。在他们身上展示了‘不耻落后，意气奋发，放胆开拓，争先创优’的闽东风格。”他又讲道，“滴水聚成的涓涓细流，将汇成江河奔腾向前。《滴水集》的汇编，旨在讴歌时代精神，弘扬社会正气，发挥英模人物和先进集体的典型示范作用，将艰苦创业精神发扬光大，成为推动闽东各项工作的巨大力量。”

　　二是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他往往能够在务实的基础上把眼光放长远，以大气魄、大胸怀来规划全局。作为一方的领导，他不仅抓大事，而且作决策、干工作非常注重符合客观实际。比如在宁德，习书记一方面肯定各地有发展思路和举措是好的，体现的是干事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对那些不符合实际的想法适当“泼凉水”，让干部群众意识到急于上大项目是不切实际的，“抱个大金娃娃”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他当时在闽东的一个战略思维，就是因地制宜发挥资源优势，发展好农业和工业，把近期和短期的事先抓好，既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谋长远的发展，又要有“弱鸟先飞”的意识，发挥自身优势，着力跨越发展。从他发表在《摆脱贫困》一书中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他当年对闽东的发展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1992年，习书记在福州提出“3820”工程，制定了福州3年、8年、20年的发展规划。作为一个福州市委书记，会考虑20年的发展，这充分体现了习书记立足长远、放眼全局的战略思维。

　　缩小山区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提高全省综合竞争力，加快建成海峡两岸繁荣带，是福建历届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重大问题，其根本途径在于实现山海联动发展。1998年初，在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领导下，我们组织全省9地市、55个省直单位进行8个月的调研活动，提出了意见与建议。1998年11月召开的福建省委六届九次全委会上，通过了两个决定，一是进一步加快山区发展的决定，二是进一步加快发展海洋经济的决定。在习书记领导与总策划下，撰写了《展山海宏图，创世纪辉煌——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研究》一书，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山海联动发展的战略选择、目标定位、实现途径等进行明确阐述，便于指导和实际操作。书中关于“加速推进山海协作的战略构想”的实施步骤，分3个阶段共12年时间实现，每个阶段都有主要目标任务及要求，考虑得十分全面，策划是高瞻远瞩的。

　　习书记任省长以后，还提出了建设生态省的理念，在充分调研基础上请专家进行论证，他还亲自到北京去汇报情况，中央有关部门作出了批复。如今，生态建设已经成为热门话题，而早在十几年前，习书记就已经展现了他的前瞻性和预见性。

　　三是具有开拓精神，注意工作效率和成效。他任省委副书记时，分管统战工作，有两项工作很有开拓性：一项是召开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当时，省四套班子中与统战工作有关系的部门、团体近10个，常发生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的现象。从1996年至1999年4年间，习书记共主持召开了10次统战工作联席会议，避免了工作重复安排或互相扯皮现象，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成效，反响很好。还有一项是开展省海外联谊活动。习书记分别于1997年12月、1998年9月、1999年7月，在深圳或珠海召开香港、澳门地区顾问、理事扩大座谈会，探讨新形势下福建如何面对挑战和机遇，每次都有100多人参加，加强了闽港澳经济文化合作交流。这样开会大大节省了港澳同胞往返时间，也大大提高了座谈会的参与度，深获港澳同胞赞誉。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在日常生活中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李育兴：****习书记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亲民。他到闽东就讲“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并提出“四下基层”的工作制度。他认为只有到基层去调研，才能知道人民的疾苦，才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和盼望，了解群众的思想和困难。一到闽东，他就到基层了解情况，他对老区少数民族群众更有感情。调离闽东的时候，他专门到挂钩点福安县和工作条件最艰苦的寿宁县，以及3个联系点去告别，这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习书记非常尊重和关心老同志，不论在什么地方工作，都时常去看望老同志，对老同志嘘寒问暖，老同志有什么困难都尽力帮助解决。福建省老区办主任对我讲过，习书记调离福建的时候，还不忘通知老区的老同志来一起吃个饭，叙旧、谈心。这其中，习书记跟项南同志的友谊令我印象尤其深刻。项南同志思想很解放，习书记非常尊重他，一有机会就向他请教。习书记最后一次见项南，刚好是我陪他一起去的。那是1997年11月10日。这之前，我随习书记到印度出访，9日回到北京，10日下午他就叫我陪他去看望项南同志。我们到了以后，看到项老西装革履，精神矍铄，原来是当天晚上他要参加两场与全国扶贫基金会有关的接待活动。项老看到习书记非常高兴。习书记给他介绍出访情况、福建情况，两个人谈兴很浓，一直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项老还一直把我们送到电梯口。结果万万没想到，项南同志就在当天晚上10点半心脏病突发去世了。他们两人超越年龄的友谊令人感动，这份友谊的根基就在于两个人对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的一片赤诚之心。

　　习书记对基层干部非常关心。习书记跟福安县坦洋村支部书记刘少如关系很好，有一次他到宁德调研，听说刘少如生病住院，他就到医院里去看望刘少如，还交待医生要认真治疗。刘少如的孩子刘志勇到福州去见了他好几次。刘志勇回忆说：“1989年7月，我有幸与习书记一起参加全省党建研讨会，一周的接触中，他总是令人感觉那样的随和友善，极具亲和力，促膝交谈中虽言语平淡，我却能时时感受到他宽广的胸怀和崇高的思想境界。”刘志勇说，习书记教导他要干正事，走正道，树正气。1997年到2000年，习书记还曾两次接见他，每次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农村的朋友，你来了！”刘志勇有一次向习书记反映福安准备开发白云山旅游项目的事情，习书记立刻放下手中的一切事，认真看完刘志勇带来的项目报告。他从不觉得自己是领导干部，都是把自己放到人民公仆的位置上，和老百姓交朋友，为人民尽心尽力干实事。

　　习书记非常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但他对干部的要求很严，如果干部做得不好，他就会严肃认真地批评。不管是在宁德还是在省里，他都很注重讲究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

　　习书记为官清廉，崇尚节俭。他在地委大院的办公室陈设很简单，从他来到走都没有改变过，他坐的车也是旧车。习书记的廉明还体现在他对家属要求很严格，在宁德时，彭丽媛老师来，很多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他讲的几句话闽东人至今都还记得：“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你发财就不要想当官，当官就不要想发财。”“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些告诫避免了不少干部犯错误。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主政宁德的经历，对他人生发展以及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有哪些影响？****

****李育兴：****总体来说，习书记主政宁德的两年是他人生的重要节点，宁德是他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形成地和实践地。我感到，这其中有以下四个原因。

　　一是闽东独特的地理条件。闽东有山有海，是他接触山海的开始，山区怎么发展，海洋怎么发展，山海如何协作发展，如何念好“山海经”，给他提供了不少实践的样本。

　　二是闽东独特的区情。“老、少、边、岛、贫、教（宗教）”，闽东方方面面都涵盖了，为他日后处理类似问题积累了经验。在闽东的工作经历，也让他对老区的历史、老区的精神、老区的贡献、老区的牺牲有了更深刻的感受，使他更加重视老区工作与老区的发展。闽东畲族的现状与困难，畲族的特点，畲族同胞对革命的贡献，会加深他对畲族同胞的感情，宁德的经历对他如何指导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如何加强民族团结提供了很好的经验。闽东作为全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之一，贫困群众的困难及期盼，习书记了解得十分清楚，如何带领他们摆脱贫困是习书记主政宁德两年的一项主要任务，这方面的思路、实践、成效及经验，他已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作了分析和总结，对他以后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如何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提供了很好经验。闽东的宗教工作突出，当时是宗教地下势力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之一。习书记多次专题调研宗教工作，并采取了不少措施。闽东的工作经历，使他对宗教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对宗教政策及如何做好宗教工作有不少认识与体会。

　　三是当时独特的“时、势、位”。1988年到1990年，正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时机，又是经济上治理整顿的时机，同时也经历了“1989年政治风波”，所以“懂形势，知全局，明精神”很重要。习书记把握整个全局和形势，将中央精神同宁德本地实际结合起来，审时度势做好工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也成为他从政生涯中一段难忘的经历。

　　四是独特的使命。习书记主政宁德后，担子重了，责任大了，管理宁德地区9个县，既是锻炼，又给了他发挥作用、有所作为的空间。我感到宁德工作给他很多启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是谋全局，一个是谋万世。“不善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从全局考虑很难做好当地工作；“不善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考虑长远的发展，就很难对当下的发展有清晰的思路。所以习书记的发展思路都考虑得很全面、很长远。

　　我在习书记身边工作的那段岁月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但从他身上学到的知识、修养、工作方法，让我一生受用不尽。他不仅是我的领导，也是对我的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良师益友。

## **“宁德是习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策源地和练兵场 ”**

### ——习近平在宁德（三）

**采访对象：**邱树添，1968年9月生，福建宁德市蕉城人。历任宁德市（县级）委报道组组长、《闽东日报》主任记者、副总编辑，宣传部调研员等。2013年8月由市委副秘书长调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闽东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2017年3月当选宁德市社科联主席，市政协常委。

**采 访 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

**采访日期：**2017年6月4日

**采访地点：**宁德市三都澳迎宾馆

****采访组：您一直在宁德从事新闻宣传和社科研究工作，从研究的角度对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的情况多有了解。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如何理解宁德工作实践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发展中的位置。****

****邱树添：****近30年来，我主要在宁德的新闻宣传和党务战线工作，尽管与习近平总书记的直接接触并不太多，但他在宁德、在福建工作期间，很关心宁德的建设和发展，我有幸多次随同他下乡调研视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工作。尤其他当年去过的那些乡、村，我后来抽空基本上都去过，因为工作关系有些地方还多次去过，算是“补课”，十几年来也利用空余或工作便利做过一些田野调查和资料收集研究。因此，对他的施政理念、总体谋划有了更深的思考。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从政生涯的宁德篇章，是他治国理政思想的理念萌发、理论雏形和实践源头，也可以说是重要策源地。他提出的许多令人耳目一新、津津乐道的理念和思想，都可以从宁德听到先声，找到破译密码。因此，对总书记宁德的从政经历深入挖掘梳理，全面展现他的心路历程，很有意义。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刚到宁德时，听说当时人们对他的期望值很高，他是如何回应人们这种期望的？****

****邱树添：****习书记刚到宁德，给大家的印象就很深，因为他很与众不同。首先，他为人朴实随和。他的衣食住行都很简朴，说话办事也很和气，见人习惯先笑一笑。第二，就是博学。他爱读书，一到宁德就找各地的县志来看，懂的东西很多，什么事情都能讲出些新鲜话来。第三，做事大气。今天，我们从《摆脱贫困》这本书里可以感受到，当时他所谋划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个地委书记层面的思考。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他很有精气神。人们在私底下悄悄议论，说仔细看习书记走路的样子，多精神，人家没有说到了咱们贫困地区就无精打采的。放到以前，我们宁德的领导到省里开会都不敢往前坐，就是因为没底气。习书记却不是这样的。

　　习书记的父亲习仲勋同志是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加上他本人也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过，大家普遍认为他比别人有更多人脉优势，更容易向“上面”要特殊政策、要支持帮助，所以对他期望值确实很高。那一段时间，修建福温铁路、开发三都澳港口和建设中心城市这“三大梦想”，一度成为宁德社会上下的热议话题，宁德的干部群众中弥漫着一种急躁情绪。穷则思变，求富心切呀！再加上习书记这么一个背景，大家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能发生变化，抱个“金娃娃”。

　　面对广大群众的“高温”，习书记表现得非常沉稳，通过开展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及时给大家作了必要的降温。他提出要发扬“滴水穿石”精神，倡导“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任接着一任干。当时许多人听了，心里落差就很大，对“滴水穿石”的思路不太理解。有人说：“这个‘滴水穿石’要滴到什么时候呀？一滴一滴，得滴到猴年马月才石穿啊？”习书记很讲究领导艺术，面对这种尖锐的质疑，没有着急上火发脾气，而是十分耐心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是简单地灭火降温、简单地否定，而是添薪添水、烧温水，否定中有肯定，肯定中有否定。他对大家讲：“‘三大话题’的设想是好的，只是目前的条件还不具备。我们要积极筹划，条件一旦成熟，就可以大干一场。”其实仔细想想，1988年，全国都在搞治理整顿，怎么可能给宁德这样一个地方开口子“放水”呢？由于宁德是台海前线地带，国防建设需要远远大于地方发展，整个“一五”到“六五”期间，国家和省里对宁德的投资极少，根本就没有工业布局。一眼望过去，连根冒烟的工厂烟囱都见不到。那时大家开玩笑说，宁德除了火葬场有根大烟囱在冒烟，其他的地方都不大冒烟。什么基础都没有，连电都供应不上，拿什么去发展工业？拿什么搞“三大话题”？

　　习书记提出，为宁德百姓谋取利益，首先要立足实际，确定阶段目标，先搞以吃饱穿暖为主题的摆脱贫困、脱贫致富。经过反复的宣传讨论，他很快就把干部群众的思路引导到这个方向上来，从而为闽东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现在回过头来看，习书记当时作出那样的决定并不容易。但实践证明他的决定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

　　在贫困面前，习书记不是光要求立足实际，还强调自力更生，强调“滴水穿石”的关键在于不停地“滴”。他在调研中发现，宁德的贫困意识严重，言必称贫，认识上有问题，自信心不强，内生动力不足。表面上看是老百姓讲实惠，认为讲半天大道理，不如给一点小钱，搞个项目支持一下，帮助解决几个困难，实质上是“等靠要”思想，是一种典型的贫困意识。宁德明明有那么长的海岸线，为什么偏偏喜欢讲自己是山区？因为大家觉得是山区自然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戴着贫困帽子，争取国家更多救济。

　　当时，像这种贫困意识，可能不光宁德人有，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存在，只不过宁德更严重一些。当然，宁德的区位确实比较封闭，不管是陆路还是海路，资源都进不来，产生“等靠要”思想有其客观原因。但反过来想，一直戴着贫困帽子，就能解决贫困问题吗？所以习书记提出，要真正摆脱贫困，还是要自力更生。2016年春节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网与宁德福鼎市赤溪村村民代表视频连线，充分肯定“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鼓励闽东人民继续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久久为功，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采访组：面对宁德的落后面貌和复杂情况，习近平同志是从哪里开始入手改变这种局面的？在您看来，他有什么成功之道？****

****邱树添：****习书记一到宁德，就下乡到基层搞调研。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生去深入了解宁德。一方面，从书本上了解历史上的宁德，翻阅各县的县志；另一方面，从基层了解现实的宁德，下乡了解实情。在掌握大量情况基础上，采取了一些措施，摆脱贫困的努力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习书记1990年调任福州的时候，宁德的经济发展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和潜力。尽管还处于“经济老九”的位置，贫困的帽子还没有摘，但是摆脱了贫困线，把温饱问题解决了。当时《人民日报》还专门刊文，报道闽东摆脱了贫困线。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如果要说习书记的宁德经验或成功之道，按他讲得比较多的主要有两点：一个是靠党的领导，另一个是靠人民群众。这既是他教导大家的工作原则，也是他自己的心得体会和行动准则。我个人认为，还有一点是很值得一提的，那就是他的创新创造。党的领导是方向，人民群众是基础，他个人的智慧就体现在超常的创新创造上。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习书记的思路和智慧归根到底还是来自基层，来自人民群众。他与群众的关系，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深入”和“密切”。因为深入而密切，又因为密切而深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提出“四下基层”工作制度，您认为这项制度是如何推动闽东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

****邱树添：****我体会，习书记提出的“四下基层”，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方面面的建设，其中蕴含着许多尚未破解的政治密码。

　　“四下基层”的一条主线是转变干部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但核心和关键却是促发展。从信访接待到现场办公到调查研究，再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都有内在的逻辑，是相辅相成的。当时，一些机关干部整天浮在上面，不下基层，那怎么为老百姓谋发展呢？如果发现了基层的问题，又如何找到思路、为百姓排忧解难呢？这四项制度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四下基层”的第一个方面是信访接待下基层。宁德山高路远、交通闭塞，即使坐车到最近的一个县城也要两三个小时，老百姓跑来跑去上访更不方便，信件寄来寄去也不现实，贫困老百姓哪懂得寄信，深山老林里面也没法寄信。况且，坐车是要花车费的，老百姓宁可走路走一天，也要省下5块钱的来回路费。再说了，他们跑上来以后，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谁，两眼一摸黑，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习书记推出信访接待下基层，就是要主动贴近百姓，可以看出他对老百姓的态度，他是真正关心百姓疾苦。上级部门固定时间到各个县里去接访，变老百姓的“上”为干部的“下”，了解情况更加直接。

　　第二个方面是现场办公下基层，以及第三个方面调查研究下基层，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宁德这个地方，多年来交通极其不便，要解决基层发展问题，更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关键还是要深入基层一线去处理。现场办公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一时拍不了板、定不了案的，就在调研当中解决。调研形成的成果又反过来促进各个部门到基层进行现场办公，无形中提高了工作效率。不然的话，工作变成了马拉松，那还怎么摆脱贫困，弱鸟还怎么先飞、快飞？如果说信访接待下基层还是为百姓方便考虑，那么调查研究和现场办公下基层主要就是破解发展中的问题，帮助百姓找到脱贫致富之路。

　　第四个方面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政策最能稳人心。如果大家思想不稳定、不统一，就难以解决好发展问题。这就需要加强新闻宣传，通过加油鼓劲来推动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不能光靠几个干部跑几个村子，那样覆盖面太小，还要依靠宣传工具依靠媒体，当时最主要是依托报纸。所以习书记很重视办报办刊办台，他不是为了宣传个人，而是为了把它作为一种工具和抓手。一份地方报纸的发行量至少也有一两万份，影响力相对大。如果仅靠干部的嘴巴去宣讲政策，一个个都磨破嘴皮也说不清，影响面也有限。在他的推动下，停刊20年的《闽东报》很快复刊，《闽东通讯》随后创刊。他离开宁德之后不久，电视台也建立起来了。这些都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有效途径和舆论阵地。

　　因此，我认为习书记主政宁德最大的政治密码就在“四下基层”里面，“四下基层”提纲挈领，环环相扣，既谋一时、谋一域，也谋一世、谋全局。抓住这个主题，可以感受到习书记当年的谋划和意图，把握他在宁德施政的大致脉络。

****采访组：您刚才谈到，“四下基层”工作方法蕴含着习近平同志宁德施政的政治密码。那么在这种全面性的工作布局之下，闽东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哪些积极变化？****

****邱树添：****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是习书记在宁德工作的最大特点。现在很多人看到他出手反腐倡廉，带头抓党的建设抓思想政治工作，重视新闻舆论阵地建设和宣传工作，就联想到一个党务干部的形象。实际上，习书记对经济也非常在行，他最提倡的是“经济大合唱”，强调要把党的建设、党委领导当作推动经济发展的总抓手。他说：“每首歌，每支乐曲，都有它的主旋律。主旋律是歌曲的主体和灵魂。一个地方的工作，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也有主旋律——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墙上挂多少面锦旗，少了经济建设这一面就不风光。经济工作的主旋律要求每个部门、每个单位自觉配合，主动协调，总指挥就是地方党委、政府。”

　　在闽东工作期间，他首先提出农业发展要立足宁德实际，大念“山海经”，即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就是如何挖掘好山海资源的问题。宁德区位特殊，既有大面积的山区，还有更大面积的海域。其中陆地面积才1.34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就有4.46万平方公里，是陆域面积的3倍多。这些特点决定了宁德要发展，必须依赖山海资源的联动，念好“山海经”。他还特别强调两点：第一，单靠传统的农业肯定不行，在山上靠种田效益太低，没有前途。第二，他所说的农业不是小农经济，属于现代化大农业范畴，一个重要支撑就是工业化，着眼于农业产品再加工。所以他提出也要大办工业，工业农业两个轮子并转。

　　其次，老百姓脱贫致富，要靠项目和产业支撑。他提出山区农业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重点发展林、果、茶和饲养业，项目要分“短中长”期，提倡“种养加”结合。短期养鸡养鸭，还可以养长毛兔、生猪等。中期产业就是发展林、茶、果等，还有比较传统的蘑菇、食用菌等产业。短中期项目投资少、见效快。长期的就是抓特色产业，解决发展后劲问题。闽东的果品很丰富，晚熟龙眼和荔枝都有一定名气。不难看出，这些要求和他现在提出的精准扶贫理念，以及“扶贫脱贫要下绣花功夫”有异曲同工之妙。

　　习书记在宁德抓经济，尤其重视海上的养殖产业。他引导大家念海经，主要是从养殖业入手，依靠科技搞好深加工和综合系列开发。早期宁德的渔民主要搞一些外海的捕捞，不太懂人工养殖，效益比较低。习书记来了以后，先是推广对虾养殖，随后又把目标锁定在大黄鱼身上。大黄鱼又称国鱼，像黄花姑娘一样，非常娇贵，头颅左右长着两粒白色坚硬的“矢耳石”。现在野生的基本上见不到了，如果有，一斤大约要5000块钱。由于长期过度捕捞，这种渔业资源早就枯竭了。怎么办？习书记就让当时的水产科技人员去研究、去攻关，解决大黄鱼的人工养殖问题，他离开宁德之后不久，这项技术获得关键性突破，后来还拿了农业部科技进步奖。所以实现规模化养殖，今天大家都可以吃到大黄鱼了，宁德的三都澳也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大黄鱼海上养殖基地，被中国渔业协会授予“中国大黄鱼之乡”的称号，每年有30万的网箱养殖量，产量大概10多万吨。有了山上的特色农产品，再加上海上的人工养殖，老百姓就可以唱好山歌、念好海经、耕山牧海奔小康了。

　　此外，在经济发展中，他特别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他说：“弱化了的集体经济实力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既无力兴办农村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事业，也无力满足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他经常到自己挂钩联系的乡镇走访调研，帮助当地推动产业发展，鼓励乡镇办水电，搞茶园。他还经常请一些知名企业的负责人来宁德开座谈会，为宁德乡镇企业发展出谋划策。

　　为了营造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舆论氛围，把经济的大合唱烘托好，习书记还千方百计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抓典型示范带动。他把脱贫致富方面小有成就的人邀请到地委机关，不管是种香菇发财的，还是卖茶叶致富的，都请来给全区副科级以上干部作报告，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给老百姓添志气，从思想上脱贫。人们都说，这是“泥腿子坐讲台，山鸡飞上了凤凰台”。

　　可以用一组数字说明习书记在宁德抓经济的政绩。他1988年到宁德，1989年宁德财政收入就达到1.9亿元，增加了5000万元。而1987年整个宁德地区财政收入也就1.1亿元，1988年也才1.4亿元左右，这意味着财政增幅将近40%。何况还是台风频发、大灾之年。宁德这样的起点，有这样的增幅，是很不容易的，如果对经济不内行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成功的秘密，就在于唱好了经济“大合唱”，实现了工业、农业两个轮子一起转，抓实了项目，壮大了集体经济。当年全区人均纯收入554元，比1987年增加200多元，基本解决了绝大多数贫困户的温饱问题。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很重视挖掘山海资源，把发展林业作为振兴经济的一个重要抓手。在您看来，这与他一直以来倡导的绿色生态建设有哪些内在联系？****

****邱树添：****我认为，习书记在宁德时期抓林业建设，不仅仅是绿化荒山的考虑，更是将其作为闽东人民摆脱贫困的一个重要出路。甚至说，他在宁德提出的“三库”（水库、粮库、钱库）绿色生态理念，是他后来在福建省提出“两生”思路（即划定“生态红线”、建设“生态福建”），乃至后来在浙江省提出的“两山”思想理论源头。

　　上世纪80年代，闽东的林业问题比一般地区要严重一些，因为这里是全国第一批开展大规模食用菌种植的区域之一。食用菌栽培要用椴木，于是老百姓除了日常烧火做饭，还要大量砍伐树木，作为栽培食用菌的“土壤”。久而久之，森林资源遭受严重破坏。

　　1989年2月，宁德地区召开规模空前的林业工作会议，习书记在会上强调：“林业不但蕴藏着很高的经济利益，而且还有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林业在发展经济和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还非常有创见地提出：“森林是水库，是钱库，是粮库。”这里的钱库，就相当于把森林当做金山银山。他还在《闽东的振兴在于“林”》一文中说，闽东的发展，山是载体，财富在林，广种林木是闽东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他还特别讲到三个“重要”，即林木是财政增长的重要来源，工业农业乡镇企业的重要依托，出口创汇的重要基础。这些都深刻体现了他对生态的重视。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习书记不仅提出从经济效益角度看待林业建设的创见，而且有针对性地提出，要以稳定的政策体制打消群众的顾虑，从根本上提高大家造林的积极性。

　　他抓住解决林业政策和祖宗山权两大难题，提出坚持“谁造、谁有、谁受益”的原则，做好林权“三定”工作。地区行署还制定出台《关于发展我区林业生产若干问题的意见》，就“巩固林业‘三定’成果、自留山、集体山地承包经营、集体林木承包经营、山地开发利用、控制森林资源消耗、发展食用菌原料、封山育林、林业违规处理”等9个事关林业发展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习书记还提出，促进林业发展还要抓住完善林业责任制和健全林业经营机制这两个关键环节。特别是完善林业责任制方面，地、县（市）、乡（镇）实行领导干部任期林业目标责任制，层层签订造林绿化责任状，把林业工作列入任期和年终考核内容。同时还在各县（市）、乡（镇）创建造林示范点，对推动全地区造林绿化起到了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

　　可以说，习书记在宁德提出的绿色生态论述，既有总体思路，又有具体抓手，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造林热情，而且取得了显著成效。他提出的“三库”理念是他一系列执政理念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至今仍然在闽东这片沃土上散发着夺目光芒。

****采访组：在推动闽东摆脱贫困、发展经济过程中，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畲族群众的福祉。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邱树添：****习书记重视少数民族福祉，是因为他太了解中国国情，太懂得百姓疾苦了。曾经宁德最贫苦的有三种人。一种是居住在山上的，又叫“山客”或者“山哈”，以畲族居多。历史上他们是外来人，在平原地带没有生存空间，只好跑到山上去，在山林之中生活。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住着茅草房，冬天冷得要死，夏天热得要死。下起雨来，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条件非常艰苦，病死率很高。还有一种也是外来人，从海上漂过来的，叫做连家船民，生存保障就是一条船，五六米长，一两米宽。又称“疍民”“海上吉普赛人”。由于长期生活在船上，他们一般个子都很矮，腿长期站不直，形成“内八弯”，腿脚呈曲蹄状。旧社会有句话讲：“曲蹄爬上山，打死不见官”，意思就是这种人如果上了岸，有人把他给打死，官府都不予受理。可见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之低。第三种人是居住在地质灾害多发、滑坡地带的人。因为灾害多发，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

　　对这些情况，习书记都非常清楚，所以不管是他在宁德期间，还是到福州、到省里工作，对这些少数民族群体的生产生活状况始终非常关心，大力促成了与他们有关的“造福工程”的实施。可以说，各民族群众共同摆脱贫困、致富奔小康，这是习书记心中最深的牵挂。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非常重视新闻工作，直接推动了《闽东报》复刊，并且对办好报纸、加强新闻宣传工作提出明确而具体的要求，您在《闽东日报》工作多年，请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邱树添：****在我党政权建设中，习书记深知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对新闻工作的重视，主要集中体现在宁德的“一报一刊”上。“一报”就是《闽东报》（1993年改为《闽东日报》）。

　　这份报纸从复刊到成长，他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当时福建全省只有宁德没有地方党报，而闽东发展中的困难不少，迫切需要依托报纸来统一思想，落实好地委行署的决策和部署。于是，习书记指示，地委研究很快成立了一个复刊筹备领导小组，由地委副书记牵头当组长，行署副专员、地委宣传部长配合，从各个部门抽一些人，前后大概半年时间就把报纸办起来了。当时办报条件非常有限，可以说一穷二白。没有多少钱，习书记硬从财政的“牙缝”里挤出10万块钱当启动经费。没有办公地点，他就去借军分区的房子，甚至“动用”自己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身份，把租金也省了。

　　1989年11月1日，《闽东报》正式复刊，习书记专门写了复刊词，刊在头版上。此后又不断帮助解决报社方方面面的困难。1990年5月，他离开宁德时，在基层与新任地委书记陈增光交接中，也不忘在市直机关召开最后一场座谈会，就是5月3日在《闽东报》会议室召开的新闻宣传座谈会。1996年8月10日是报社大楼奠基的日子，那时习书记已是省委副书记了，他特地从福州赶来，与前后几任地委书记共同参加奠基仪式，可见对这份报纸的重视和感情。他到了省里之后，还经常看《闽东日报》，曾两次对《闽东日报》作出重要批示。一次是2000年9月14日，我和时任报社总编及总编办主任3人一起采写了一篇关于宁德蕉城区特困乡洪口脱贫致富情况的文章，登在《闽东日报》头版头条上。已是省长的习书记看到这个报道之后，就在上面做了100多字的批示。还有一次是2000年11月9日，《闽东日报》写了一份内参，反映城区边上一个村子道路不通的问题。他再一次专门做批示，要求地委行署认真加以重视。后来我们陪着当时的地委书记到现场察看调研，最终把这个路修好了。

　　习书记还曾3次为《闽东日报》撰文题词或发贺信。第一次是刚才讲到的，撰写复刊词；第二次是1999年复刊10周年的时候，他已经是省长，还专门题词“为振兴闽东服务”；第三次是2004年6月16日复刊15周年的时候，他已经是浙江省委书记，还特意发来贺信，其中特别讲到了“三贴近”原则和服务“三个文明”建设的要求，希望《闽东日报》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另外，“一报一刊”的“一刊”，是《闽东通讯》。1990年创刊，地委主办。当时也是习书记写的发刊词，后来也对这个刊物有很多关心和关注。

　　关于如何做好新闻宣传工作，习书记有自己的鲜明观点。他有两篇重要的文献值得深入研究，一篇是为《闽东报》撰写的复刊词，题目是《坚定方向弘扬正气振兴闽东》；另一篇是《摆脱贫困》一书中收录的新闻工作会议讲话，题目是《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在《闽东报》复刊词里，习书记开宗明义地指出“坚定方向、弘扬正气、振兴闽东”的办报方向，提出了明确的办报宗旨。一般来说，地委书记能讲到办报宗旨已经很可以了，但是他又讲出了“四为主”的编辑方针，要求报纸“坚持以经济建设报道为主；以正面报道为主；以地方消息为主；以新闻报道为主”。他甚至还引经据典，援引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工人〉发刊词》的话，讲报纸该怎么编。可见他是下了一番功夫，是很内行的。现在再读这篇二三十年前的复刊词，感到很多话仍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启示性。

　　1989年5月，习书记在地区新闻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的讲话，其中阐述了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新闻观。他说：“我们的党是从人民中产生的，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性和人民性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强调的党性，饱含着人民性的深刻内涵。新闻工作者就是既要宣传党的主张，又要充分体现人民的愿望、要求，把两者统一起来。”如果把这篇讲话同他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放到一起对照来看，我们就会感受到，思想极为深刻，内容一脉相承，对推动工作的作用不言而喻。所以我认为，宁德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之源，也是他新闻宣传思想的源头，他当时所讲的这些话，其实不仅是站在宁德地区的层面来谈论新闻宣传，而且是站在全局的高度提出的新闻宣传观。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直把自己当成闽东人，他说过“宁德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您认为，主政宁德对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有哪些影响？****

****邱树添：****我想这个影响应该是非常大的。总的来讲是重要策源地和练兵场。首先，从思想层面上来看，一个人到了30多岁，逐步进入成熟期。宁德岁月，加深了他对基层、对群众的理解。他早些年生活工作过的陕西梁家河和河北正定，地形不像闽东这么复杂。陕北主要是一些塬梁，在宁德随便走到哪一个山都比那边最高的山还要高，境内海拔一千米以上的山峰有696座，像总书记去过的下党乡，四面八方都是这种山，那真是“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如果不谈生活水平，单从环境来看，这里的条件也更艰苦。厦门是一马平川，没有山，也没有住在深山老林里的人。在梁家河，坐车坐半个小时把周边都转遍了，去哪里也不可能像到下党那样，下了车还要走两三个小时才能进去。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讲，这种经历加深了他对国情的了解，促使他去思考一些现实问题，如何跨越东西南北如此巨大的差异来实现发展。如今，身为总书记的他仍然面临着解决差异的问题。所以说，从北京到农村，从农村到城里上大学，再从北京返回到县里，再从特区到宁德这么一个“老、少、边、岛、穷”的地方，必然在思想层面上给他带来深深的触动和感悟。

　　其次，从工作层面上看，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德这样贫困的地区，需要面对两个方面的考验。第一是责任担当问题，能不能沉下心来帮助这个地方谋发展。第二是水平能力问题。光有党性和责任感，缺乏智慧也不行，必须有创新能力和推动发展的能力。按部就班做事容易，创新创造很难。尤其是在体制机制上存在各种阻碍的情况下，不改革不创新，宁德怎么摆脱贫困？穿衣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都倒逼着他去想办法、去尝试，拿出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来。如今，他也要应对国内外各种复杂的形势，由此提出了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与当年也是一脉相承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铁腕惩治腐败，“打虎拍蝇”，重塑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实际上，他在宁德就提出，经济发展需要廉洁政府，廉洁政府具体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就是党政干部的廉政问题，这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败，绝不允许有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谋私利。他到宁德后，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一方面明确经济发展的大思路，一方面整顿作风，确定了坚持惩治腐败、促进改革开放的方针，强力反腐。1989年1月开始，突出肃清干部违法乱纪占地建房、以权承包工程和贪污受贿，并把严肃查处干部违法乱纪占地建房确定为惩治腐败的突破口，对惩治腐败的斗争作出全面部署。与此同时，狠刹歪风，着力抓好查处吃喝、请客送礼、赌博、拖欠公款等问题，让人民群众看到地委转作风是动真格的。此外，他还强调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赖以生存的温床，建立一套系统、全面的制度来制约和监督权力使用，实行了“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建立廉政责任制。他还破天荒地提出要正确区分违法乱纪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失误，保护改革者的积极性，鼓励干部为人民事业敢为天下先；既要敢于惩治，又要善于激励，自始至终把握好政策，等等。这些提法，又与今天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举措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高压反腐，扭转风气，还有我们前面谈到的，当年的“四下基层”工作制度与如今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呼应，都是管总的东西；讲党性与人民性关系问题与现在提出的意识形态工作要求的呼应，也是一以贯之的。他当时还兼任宁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军民共建、军民融合发展也有许多重要论断。

　　所以，我们今天回顾习近平总书记的宁德岁月，似乎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他来到宁德这么一个偏远贫穷的地方，却孕育出超前于那个年代的思想观念，产生出了影响他未来治国理政一系列重要思想的雏形。看似偶然，但偶然中往往喻示着必然。因此，我认为，宁德就是习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策源地和练兵场。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陕北的梁家河是他的第二故乡，河北的正定让他触景生情，而福建的宁德则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他不是随意而谈，都是真情的流露。我理解，只有那个可以完完全全身心融入的地方、让人能有充分发挥才智的地方、人物风景相亲相吸的地方，才值得在梦里相约，在回忆中流连。

　　习近平总书记虽然不是福建人，但他在福建工作了17年半，身体里天然地奔腾着红色革命热血；老区虽然比较贫穷，但这里也有最纯朴的革命情怀。闽东的干部群众发自内心地亲近他，真诚地支持他。他1990年1月写下《闽东之光》一文，满腔热情地说出“知我闽东、爱我闽东、建我闽东”的话语，还有他在给宁德地直机关领导干部的临别赠言中动情地说：“人虽然即将离开闽东，但我留下了一颗热爱闽东的赤诚之心，我会时常牵挂、关注闽东的工作，积极为闽东的发展进言献计。闽东的点滴变化，都会给我带来无比的喜悦和欣慰。”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言为心声，言行如一，说明他已把自己当成一个闽东人来看待。他以实际行动给闽东干部群众树立了榜样，也由此获得闽东人民的衷心爱戴。他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明确提出的“滴水穿石”精神，是闽东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闽东人将永远不辜负他的嘱托、期待，永远秉持闽东精神，继续创新发展，为建设美丽家乡、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拼搏。

## **“习书记在宁德就提出以辩证思维看待财政经济问题 ”**

### ——习近平在宁德（四）

**采访对象：**张学清，1945年7月生，福建连江人。1985年4月任宁德行署副专员，1994年任行署党组副书记，1995年任行署常务副专员。1996年8月任福建省物价委党组书记、主任，2000年2月任省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2005年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2008年12月退休。

**采 访 组：**沈 凌 薛伟江 桑 熙

**采访日期：**2019年6月4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张学清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时，您是行署副专员。他刚到宁德时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张学清：****习书记到宁德时正值夏天，天气热得很。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却像一袭清风，让人耳目一新。他给我的最初印象可以总结成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开场不把锣鼓敲”。在一般人印象中，新官上任三把火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习书记却不然。他刚到宁德那天，我们班子成员集中到老地委大院二楼的会议室，原本以为会是一次隆重的欢迎仪式，可没想到习书记一点也不摆领导的架子，不仅着装朴素，而且也没有因为到一地主政就高谈阔论或是立下“豪言壮语”。相反，他只是言简意赅地向大家表了个态，表示在宁德一定做好自己的工作。这个见面会很快就结束了，让我们这些参会的同志感到有点意外。

　　二是没想到人刚来就“失踪”了。习书记到任以后，我们都做好了他找我们谈话了解工作的准备，但等了好久，我们发现他谁都没找。大家都很奇怪：新来的地委书记怎么好像“失踪”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刚到宁德没几天，就立马下乡去调研，一走就是一个月，一走就走遍了宁德的9个县，而且还去了相邻的浙江省部分地区。

　　三是没想到他要换种方式带领宁德干部“冲一下”。有一次他在和我谈话时说起，他到宁德上任之前，福建省委主要领导曾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到宁德能够好好地“冲一下”。习书记说，他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我听了感到很兴奋。因为当时我和所有宁德人一样有着共同的心愿，就是希望宁德能够抱上“金娃娃”，改变落后面貌。应该说，当时宁德经济发展的担子很重，从外部环境讲，全国正处在治理整顿阶段，通货膨胀严重，各地发展都受到制约，都在“收”；从内部环境讲，宁德作为“老、少、边、岛、穷”地区，欠账太多，关键是穷。而且，宁德为了国家和地区战略发展需要，做出了很多贡献甚至牺牲。比如说，原来古田溪水电站是福建省装机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但发出来的电主要供福州使用；宁德三都澳港是世界少有的良港，但为了国防需要，一直没有开发。听习书记说要“冲一下”，我心想，我们自己本身有港、有电，如果习书记再能拉来大项目，宁德一定能够快速脱贫。可没想到，他又对我说，宁德经济发展，慢不得，也急不得。我心想，这要怎么“冲”呢？没想到没过几个月，他就在地委工作会上提出“滴水穿石”的观念。

　　习书记说，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要受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地理因素等诸多方面的制约，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他提倡立足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而不是不甘寂寞、好高骛远的空想；他提倡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而不是新官上任只烧三把火那种希图侥幸成功的投机心理；他提倡锲而不舍的韧劲，而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他当时就讲，“几任干部一本账、一任接着一任干、任任干给群众看”，与当今提出的“功成不必在我”是一脉相承的。

****可以说，当年的习书记给宁德带来了全新的发展理念，而且的确用这些全新理念带领宁德“冲”出了新局面。****

****采访组：****从您当时分管领域的角度看，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哪些全新的发展理念？

　　张学清：我当时协助专员分管财政工作，习书记虽然是党委一把手，但对经济发展非常在行，提出很多新颖而且切合实际的观念。比如，他认为闽东的经济建设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农民问题，闽东要发展，就要走一条“大农业”的路子，即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立体农业，以农业商品观念替代以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观念。再比如，大家都知道习书记在宁德提出“弱鸟先飞”的发展理念，他意识到当时干部群众普遍存在“等靠要”思想，希望国家多拨资金，多安排一些计划内原料，但他指出要把解决原材料、资金短缺的关键，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来，这种思想意识的转变是“先飞”的第一要义。他还强调商品经济建设不能搞政治和经济“两张皮”，各县的五套班子都要围绕经济建设来做好本部门的工作，搞“经济大合唱”。他在基层调研时听到有不少同志反映乡镇非经济工作牵扯了乡镇干部的大部分精力，就提出要杜绝这类状况，强调乡镇干部的主要精力和时间要用在经济工作实践上。这些观念和要求，在今天看来都是有现实意义的。

　　习书记专门就闽东财政经济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充分展示了他的辩证思维。他认为，财政经济绝不是只管收支的钱袋子，而是调节经济的大杠杆；运用财政杠杆的调节作用，决不能简单认为是给某某地方多发几个钱，向某某地方多收几个钱，而应产生于正确处理好财政经济的几种关系，比如全局和局部的关系，紧缩与发展的关系，多办事与量力而行的关系。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提出正确处理增加财政收入与搞活企业的关系。当年宁德很穷，我做财政工作有切身体会。1985年我刚接手工作时，宁德一年的财政收入才5000万，还比不上邻市一家酿酒厂产生的利税贡献。后来我向习书记汇报工作时谈到这些，他却对我说，要有大财政观念，不能把增加财政收入理解为“卡紧企业”，只有企业发展了，财政收入才有源源不断的活水，水涨船高、泉大水足就是这个道理。

　　习书记讲话通俗易懂，经常用很形象的语言表达一些抽象的道理。比如谈到利税大户和普通企业的税收问题时，他指出既要抱好西瓜，又要捡好芝麻，一点一滴都要做好，积少成多。增加财政收入要与搞活大中型国有骨干企业相结合，要有“先予后取，培植财源”这样远见卓识的财政观，讲究“欲取姑予”的艺术，不做“竭泽而渔”的蠢事。他还强调，在当前治理整顿、紧缩银根的情况下，财政部门更要通过资产融通，大力支持工农业发展。这些话在当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在增加财政收入问题上，他还强调要处理好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既要积极争取外界支持，更要深挖自身潜力发展地方经济。这与前面讲到的他提倡“弱鸟先飞”也是一致的。

　　我有一组数字，1990年福建全省财政收入209亿，宁德只有2.3亿；但从增长幅度看，全省“七五”期间财政年均增长17.3%，宁德年均增长27.3%，超出10个百分点，进步是显著的。从具体工作上讲，乡财建设、特产税管征在全省都得到认可，习书记在宁德开展经济工作的成效也得到了广泛认可。

****采访组：在具体工作中，习近平同志给您留下哪些深刻印象？****

****张学清：****习书记在宁德期间，有两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治理宁德标会“会灾”。“标会”是一种民间融资形式。农村里相识的村民你出一些，我出一些，大家把钱集中起来，轮流使用，有人把它当作救急良药，有人把它当作理财工具。但由于这种形式是游走在法律之外的，风险极高，不断发生“倒会”卷款潜逃事件，让不少老百姓血本无归。这在当时的宁德一度风靡。我记得1988年底的时候，原宁德县（今蕉城区）出现了一起涉及2万多人的“倒会”事件，涉案金额大，超过亿元，一些机关单位的干部也牵涉其中，影响极坏；性质复杂，其中正当的民间融资与非法的金融诈骗卷在一起；时近春节，一个县的城关镇近一半人牵涉其中，许多人为了要账到对方家里搬东西、砸东西、打人甚至非法拘禁，已影响到社会稳定。

　　1989年元月，地委连续两次专门听取关于这次“会灾”事件的汇报，问题集中到两点上：一是如何定性，二是如何处理善后。当时基层有个说法，希望政府出一种“会票”，当作官方担保的“中间人”，可这样无形中会给政府带来负担。面对这些问题，年轻的习书记明确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不要随意定性，要按证据办事。他考虑涉及的普通百姓较多，不宜轻易定性，但对其中个别明显属于金融诈骗性质的，该抓就抓，绝不姑息，对于大多数群众还是要持保护态度。第二，政府“会票”不能发。他提出，要重视民间调解方式在此类事件处理过程中的应用。这个话一出，解决方法就很活了。比如我暂时还不了这个钱，就让我家族中有声望的亲人做担保，平息各方争执；家里有什么物产，也可以用来抵一部分欠账。总之，就是运用各方愿意接受的民间调解方式来解决民间纠纷，而不是盲目把矛盾上交给政府。我们当时觉得习书记这个意见非常好，就是充分发挥民间力量来解决老百姓自己的事，事半功倍。第三，他强调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各级政府要加强力量，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控制事态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确保老百姓过一个平稳的太平年。

　　当时“会灾”导致许多群众跑到地委行署办公楼上访，甚至经常出现闹访现象，我们的干部一度很挠头，不知所措。习书记这样子一表态，大家心里都有了主心骨，开始沉下去耐心做群众工作，县里也组织公安、信访、财政、银行各领域大量干部，深入涉案群众家中帮助解决问题，慢慢就把“倒会”问题平息下去了。可以说，没有习书记当时提出的成熟沉稳的指导思想，没有他当时快速反应的应变处突的能力，没有他对基层工作、对群众的殷殷深情，是很难很快把这件事妥善解决的。我们大家都很钦佩他。

　　还记得在那一年的年终考核中，省委组织部向班子反馈对习书记的评价，有句话得到大家一致认可，那就是他到宁德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树立起很高的威信”。确实，虽然我们与习书记在宁德共事只有短短两年时间，但他领导有方，指挥有力，作风过硬，大家的心情都很舒畅很愉快，对他是口服心服。

　　另一件事就是他支持在宁德开展“三教”活动。“三教”就是重教、支教、爱教，营造全社会重视教育、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浓厚氛围。习书记当时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那时省里也下达明确要求，要在1990年之前实现教育“一无二有”，即无危房、有课桌椅。上世纪80年代末，虽然改革开放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但国家的贫困面貌还比较普遍，像我们宁德，很多学校没有专门的校舍，学生们在寺庙、祠堂里上课的比比皆是。还有一些就干脆在危房里上课，学生自己从家里搬着小凳子来读书。那时候教育系统有一组统计数据，宁德农村的教学危房有14万平方米，建在祠堂、寺庙里的校舍还有23万平方米，课桌椅缺少3万套。习书记把这件事当成扶贫惠民的一件大事来抓，1988年9月19日，他召集班子成员办公会，专门研究教育问题。他讲到：一是要肯定成绩看差距，把教育搞上去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二是一定要下决心解决薄弱环节，办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这包括我们提到的改善办学条件实现“一无二有”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解决各地欠发教师工资的问题，稳定教师队伍；三是强调要分层次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不久后，也就是1988年11月，在地委工作会议上，习书记提出把开展“三教”活动作为新一年一项重要工作来落实。1989年1月还正式出台了实施意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切实落实领导责任，把是否开展好“三教”活动作为年终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采取地、县、乡共同出资的办法，限期解决“一无二有”问题，凡是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的，不准盖新的办公楼、宿舍楼；验收工作安排在当年年底，要用解决群众关心的教育问题成效检验各级干部的工作成效；拖欠教师工资问题也要同步解决，等等。后来，宁德的这项工作成果得到了省里的高度肯定，充分体现了习书记把教育事业当成民生工程抓紧抓实的务实作风与为民情怀。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把“四下基层”作为工作常态，当时您在参与过程中有哪些体会？****

****张学清：****习书记在宁德提出“四下基层”，是他亲民务实工作风格的又一体现。当时我分管信访工作，但却是“新手”，之前没接触过，心理上有一点畏难情绪，甚至有一点担心。担心什么呢？一是怕没事找事，引火烧身；二是怕群众的工作难做，万一碰到胡搅蛮缠的怎么办；三是担心群众提出的问题解决不了；四是担心“四下基层”的机制难以持久，最后变成“半拉子工程”。当时和我有同样想法的同志还有一些，大家也都很期待，想看习书记会怎么干。没想到，他工作起来非常有章法：首先要求工作人员在基层发布公告，告诉群众我们要在哪天在哪个地方现场接访、现场办公；随后组织各有关部门，要求大家主动谋划，预判群众可能会提出的问题，提前考虑应对方案，并做好内部分工；最后，要求当天接访结束后各部门要自行小结，明确每件事落实部门和时限，争取尽快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后来，他本人亲自带队到基层接访，倾听群众所急所盼，可以说是以上率下，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宁德“四下基层”的工作机制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当时省委还专门把全省各地信访局局长带到宁德展开现场观摩，学习我们的好做法。这项工作在宁德一直持续到今天，从未间断。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三进下党”的事迹至今被广为传颂。您当时有没有参加，有哪些切身感受？****

****张学清：****我参加过一次，就是习书记1988年7月19日第一次步行到下党那次。他带领班子有关成员和相关委办局的18名负责同志一同深入下党乡，既是去调研了解情况，开展现场办公，也可以说是带我们进行一次现场教育。

　　下党当时实在太穷了。不要说基本的公共设施建不起来，平时吃饭只有盐巴调味，连酱油是什么都不知道。当时人多去了几个，连开会场所都没法子解决，在廊桥上开会、吃饭和休息，就是习书记亲自敲定的。我们看了以后，确实很受触动，觉得不把这样的乡村百姓拉出穷窝，就对不起自己的头衔和职位。我相信习书记一定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后两次再进下党，都是他自己主动去的，那里百姓的生活始终牵动着他的心。

****采访组：后来习近平同志到福建省委工作，和您还有工作交集吗？****

****张学清：****我1996年离开宁德到省直单位工作，任省物价委主任，那时候习书记已经在省委任副书记，分管“三农”工作。当时全省刚刚宣布村村通路、村村通电、村村通广播，是一件为民惠民的实事。但在通电问题上，就出现了“三乱四电”现象，即乱收费、乱加价、乱集资，人情电、关系电、权力电、偷窃电。反映最突出的就是乱收费乱加价问题，惠民的好事一度出现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乱象，当时《人民日报》还对福建这方面问题进行过披露。习书记对此事非常重视，亲自听取汇报并出席专题工作会。我们当时下了决心，一定要把电价压到1元以内，习书记知道以后非常支持，还支持我们开展舆论监督，提倡全省农民凡是遇到电价超过1元的有权拒付。在开展集中整顿的第一年，我们就为全省农民减负5个亿，第二年又减少3亿多，受到广大农民的好评。

　　2000年2月，我调任省地税局局长。那时候习书记已经是省长了，主管财政金融工作。他交给我两项任务：一是“带好队”，就是带好税务这支队伍。当时地税系统是从省到乡镇垂直管理，整个队伍有12000多人，都是“吃皇粮”的，要管好不容易。二是收好税。他下达给我们一个硬任务，就是帮劳动厅（也就是现在的社会保障局）做好社保费的收缴工作。起初，工作实施起来我才发现面临三大阻力：一是企业方面的阻力，因为收费就牵动企业，企业的负担客观上就会加重；二是随着企业负担加重，反映到政府层面，有的地方就会担心影响引进外资，继而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三是来自我们税务系统内部，不少人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毕竟税务局按理讲是依法收税，社保费收缴当时不是我们的分内工作。在认识没有统一的情况下，这件事的确很难办。

　　我向习省长汇报了自己的为难之处，他听了表示很理解，说完成这项任务，如果在人手、设备上有困难，都没关系，他会帮助我解决，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各方面的思想工作。他说，要给大家讲清楚，这个事是关系到福建社会保障工作落实、关系到社会安宁稳定的大事，税务部门要认识到这个做法的深远意义，统一思想，好好地收。他还说，针对企业担心的问题，完全可以给企业开诚布公讲明白，相信对方都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我们引进一家企业，不管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如果连这种基本的社会责任都不愿意承担，那么我们引进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简单几句话，我听出了习省长的信心和决心，也看出了他高瞻远瞩、着眼全局的领导风范。后来，为了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落实，习省长多次牵头召集相关领导和部门开会研究讨论，还专门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最终决定从2001年1月1日起，把地税征收、财政监督、社保发放作为一个工作体制确定下来，全面实施社保费地税全责征收。

　　那次开征前，全省社保费只能收到两三亿，有时候连这个数字都收不上来；2001年新体制实施后，当年就收了34亿，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厦门。今天来接受你们访谈之前，我特地打电话问省税务局社保处的处长，现在我们全省收取的社保费已经达到920亿。可以说，当年习省长为国家的社会保障事业、为全省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也亲身感受到他真是一位沉稳睿智、远见卓识的领导。

****采访组：在日常接触中，习近平同志留给您怎样的印象？****

****张学清：****和习书记共事过的人，相信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他为人沉稳、务实亲民、正派清廉。现在回想起来，他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展露出一个大国领袖必备的素养。或者说，在宁德，在福建，他的宏才大略已经初显端倪。原福建省军区司令员陈明端当时对习书记就有一句评价：习近平年纪轻轻，讲起话来有条不紊，真有大将风度。我们都很认同！ 习书记在工作和生活上对自己要求都很严格。1989年3月，他牵头制定了《关于地委、行署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主要包括12条：在职期间不准以任何名义占地营建私房；不准个人介绍基建工程；不准贪污受贿和索贿；不准违反招工、招干、招生、毕业生分配、征兵、复员转业军人安置和人事调动的有关规定，私自安插子女、亲友，谋求特殊照顾；不准在干部的提升、晋级和调配选拔上，违反组织原则和人事干部工作程序；公务往来不收礼，不向基层单位索要各种产品、礼品，索购紧俏商品；下基层不准大吃大喝，要严格要求按接待标准办伙食，按规定缴纳伙食费；不准公车私用，如特殊情况私事要用车，要向车辆管理单位缴纳用车费；不准利用职便以任何名义参与经商办企业；不准弄虚作假骗取荣誉或奖励；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带头抵制各种不正之风，不准为违法乱纪的人和犯罪分子说情袒护、徇私枉法；教育管理好家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个多月后，1989年5月15日，又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廉政建设的若干补充规定》，共5条：不准购买新的进口豪华汽车；不准修建超标准的办公楼、宿舍；领导下乡要轻车简从，不要到当地边界迎接上级领导；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除有关人员外，不要层层增加陪同人员；今后领导干部生病，各部门、单位不要用公款赠送慰问品，不以各种理由，用公款向领导赠送礼品，如有违者，财务部门不予报销，领导干部要把物品退还有关部门、单位或上交。你们看，他在30年前就针对作风问题提出如此细致的要求，直到30年后的今天，仍然强调反腐败要持之以恒，充分体现了他对作风问题一抓到底的决心，也体现了他身体力行的坦荡气概。

　　他在宁德经常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生活上要实行“最低标准”，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他到任以后不换车、不换司机、不换办公室，住就住在地委大院旁边的职工宿舍里，吃就吃在职工食堂，从没搞过特殊、开过小灶。

　　2010年9月5日，对我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晚上，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来福建视察工作，和我们几个在宁德共过事的老同志一起再叙情意。他当时讲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说福建是他成家立业的地方。他解释说，自己在厦门成的家，后来在福州生了女儿。而立业主要从宁德开始的，所以对福建对宁德有着特别的感情。他讲得实在，我们听了也很感动。

　　这一次接受你们的采访，我感到可谓正当其时。中共中央刚刚提出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通过访谈对曾经与习总书记交集过程进行点滴回顾，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体现。这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解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理解他对人民的深切情怀。

**四、习近平在厦门**

## **“近平同志来厦门是要‘立志做大事’”**

### —— 习近平在厦门（一）

**采访对象：李秀记，1937年1月生，福建南安人。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1972年到厦门工作，1983年2月起任厦门市副市长，1984年2月任市委常委，1984年12月任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1988年9月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1992年12月任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1995年8月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2009年退休。**

**采 访 组：沈凌 路也 胥晴**

**采访日期：2017年6月2日**

**采访地点：厦门市李秀记家中**

****采访组：李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到厦门任副市长时，您是第一个接触他的人。您还记得你们初次见面的场景吗？****

****李秀记：****近平同志1985年6月中旬来到厦门，那一天正好是他32岁的生日。他来的时候轻车简从，自己搭了一个便车就来了。当时我主持市委日常事务，所以我就去接他。当时，从福州到厦门只有一条路，还不是柏油路，而是砂石路，灰尘很多，也很窄，我们经常去福州开会，走这条路需要8个多小时才能到。近平同志来厦门前，省委组织部提前打了电话，说大概上午8点钟出发。我就按照经验，下午3点提前到厦门宾馆等，等到大概4点多，才把他等到。

　　车子一到，车门一开，近平同志就微笑着说：“我是习近平。”我赶快迎上前说：“我是李秀记，代表市委、市政府来接你，欢迎你来厦门参加特区建设。”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穿着简朴、年轻精神、态度谦逊。

　　接上近平同志后，我带他住进了预先安排好的厦门宾馆2号楼底层的一个房间。按照厦门的习惯，坐下来后，就是喝茶。我一边喝茶，一边给他介绍厦门的情况。近平同志听完，很高兴地说：“今天对我来说有双重意义，第一我是来参加特区建设的，二是我的生日。”我赶快站起来，祝他生日快乐！聊到饭点，我们就一起去吃晚饭。按道理，过生日应该有个蛋糕，按厦门的习俗还要吃寿面和鸡蛋。但当时条件所限，没有蛋糕。当天饭菜里有海蛎煎、炒面线、土笋冻等一些厦门的特色菜。海蛎煎里面有鸡蛋，寿面就用炒面线代替了，也算是按照厦门的习俗给近平同志过了一个生日。

　　吃饭的时候，我们越聊越近，很快就像朋友一样敞开心扉。他向我介绍了他在陕西延安的7年知青生活，我说我也在陕西工作过，也是7年，但是在一机部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工作。我们在陕西期间都入了党，还是清华校友，现在又同在厦门参加特区建设，应该说是很有缘分的，也有很多共同话题。

　　近平同志记忆力很好。2010年9月5日，他任国家副主席时来厦门检查指导工作，跟我握手时，还提起来厦门第一餐吃的三道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刚来厦门那会儿，厦门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您当时向他介绍了些什么情况？****

****李秀记：****厦门经济特区是1980年10月设立的，刚开始的时候只有2.5平方公里，而且是在一个多海滩山区的地方，经济特区管委会与厦门市政府是两个厅级单位，统一由市委领导。邓小平同志1984年2月来厦门视察后，经济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包括鼓浪屿）131平方公里。1984年9月1日，经济特区管委会与厦门市政府合并，市政府行使经济特区管委会职能。近平同志到厦门来的时候正好是在合并之后。如果说刚开始2.5平方公里是特区的初创阶段，近平同志来厦门后，正赶上厦门经济特区建设进入更快更好的发展阶段。

　　我给近平同志介绍厦门的情况，用了六个字来形容：“港、景、文、侨、台、特”。第一个字“港”，厦门有一个优良的港口，是不淤不冻的良港。港口历来都是通商的口岸，福建省的商贸活动从这里出海，这是厦门非常突出的一个特色。第二个字“景”，厦门风景优美，有鼓浪屿，有万石植物园，有集美学村，风景特别好。第三个字“文”，厦门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当时就有7所高校，厦门大学更是全国闻名遐迩的重点高校。据统计，当时厦门大中专毕业生所占比例是全国平均值的4倍，人文环境也比较开放包容。第四个字“侨”，厦门是个侨乡，是福建省华侨出入的口岸。厦门华侨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一带经商的很多，被誉为“华侨旗帜”的陈嘉庚先生祖籍就在厦门，他倾资办成的集美学村也坐落在厦门。办特区之初，厦门就是因为华侨多才从省里要下来了特殊政策。第五个字“台”，厦门与台湾一水之隔，用肉眼就能直接看到金门。过去30多年，厦门作为对台海防前线，经济建设上受到一定制约。直到邓小平同志来视察后，才慢慢把“台”这个优势凸显出来。第六个字“特”，正因为我们有上面说的这些特点和优势，中央决定设立厦门经济特区。当时给我们的特殊政策，就是特区范围内的税收可以按15%征收（一般是33%）。但一开始只有2.5平方公里，而且还有待开发。所以在邓小平同志来视察之前那3年，我们只做一些市政规划、“五通一平”之类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听我介绍后，近平同志问我：“你说了厦门的六个优势，那厦门还有哪些弱势或者弱点？”我以个人的观察，向他介绍了厦门的三点弱势。

　　一是城市规模小。整个城市就是围绕中山路那几条街，当时的城市人口只有28万。有本小说叫《小城春秋》，写的就是发生在厦门的故事，也从侧面说明厦门是一个“小城”。

　　二是经济基础差。一方面是基础设施差。当时我们的基础设施差到什么程度呢？厦门老百姓有句话说：“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自来水经常停。”我刚到厦门的时候住在市区，夜里12点以后只有一个公共自来水龙头有水，每家每户就挑两个桶，去那里接水，最初一担水一分钱，后来涨到两分钱。现在人们很难想象的场景，却正是当时厦门基础设施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特区设立之初，工农业总产值才11亿元，财政收入1.85亿元。1972年我刚从西安调到厦门工作，当时整个厦门市的工业总产值，还不如西安市一个西电公司。在之前的30多年，国家对整个厦门市也只投资了1200万元，还主要是用于海堤建设。这1200万元，我们精打细算，发动群众和解放军，用人海战术，移山填海，花了900万元修建了海堤，剩下的300万元兴建各类工厂。后来的罐头厂、橡胶厂都是用这300万元建起来的。那个时候，厦门引进外资也很少，引进的第一个外资是“印华地砖厂”，是一个印尼华侨办的外资企业。所以我和近平同志开玩笑，说厦门经济特区是从“一块砖”开始建设起来的。

　　三是市容市貌旧。当时的厦门基本上是一个“旧城”，像样点的建筑只有集美学村和鹭江宾馆，其他建筑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的。有人这样形容：“厦门像一个美丽的姑娘，却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

　　我讲完这些，近平同志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没过多久，也就是在1985年11月市委常委的组织生活会上，参会人员各自谈了自己的思想工作生活情况。近平同志说：“我来厦门工作，用孙中山先生‘不要立志做大官，而要立志做大事’来勉励自己，地位变了，作风不能变。”我相信，虽然知道厦门当时还存在很多不足，要发展还有一定挑战，但他来厦门参与特区建设，想的就是要发扬优良工作作风，立志做大事。这应该是他来厦门特区工作的初衷。

****采访组：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当时的工作状态。****

****李秀记：****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三年，参与市委、市政府重大问题的决策。当时市委书记邹尔均兼任市长，经常召开市委、市政府联席会议，个别还有市委全委扩大会议和领导干部会议。这些会议，只要近平同志在厦门，他都会参加，并就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发表意见。按照分工负责制，属于他分工范围的，他会非常认真地去负责组织实施。用通俗的话讲，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是组织决定的，他就尽力去干，而且能把事情干好。

　　厦门岛屿多，山区多。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的三年里，走遍了厦门农村、海岛，像“英雄三岛”（大嶝、小嶝和角屿），还有海拔1000多米的军营村等等。不仅如此，他还虚心学习，从来没把自己看成是什么高高在上的领导干部。当时我担任市委副书记兼纪检书记，记得有一次开大会，向党员通报整党工作报告，我看见近平同志专心听着整党情况，还认真做着笔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工作中，近平同志还特别注重发挥老干部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全市老干部他基本都走访过，还经常向老同志请教问题，听他们介绍厦门的历史，学习他们的工作经验。

　　近平同志这种平易近人、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以及注重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的工作方法，为他“做大事”奠定了坚实基础。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曾经牵头制定了厦门的发展战略，后来也具体指导过厦门的发展方向。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李秀记：****是这样的。我理解，近平同志对厦门倾注的心血，集中体现在他对厦门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向的思考上，可以说他先后两次为厦门制定了发展战略。

　　第一次是从1986年8月开始，历时一年半，他作为分管计划工作的副市长，主持编制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实际上，市委市政府之前也研究过类似的规划，邓小平同志来厦门视察后，原先的规划就需要重新考虑和制定。与之前编制规划不同，近平同志站得高、看得远。他邀请了北京的专家学者、厦门大学教授，以及在厦门实际工作多年、对发展规划有研究的同志一同反复论证，还广泛征求干部群众和老干部的意见。他很注意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接触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各方面情况。这个发展战略的成功制定，为2000年把厦门建设成为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提供了有力依据。

　　近平同志第二次为厦门发展指明方向，是他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虽然不是编制具体的发展规划，但却是更高层次的战略指导和大思路。此时，他牵头制定的厦门发展战略经过15年的实施，目标已经变成现实。2002年1月在省人代会上，近平同志在参加厦门代表团审议省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了“厦门城市规划由海岛型向海湾型转变”的思想。同年6月，他到厦门调研，提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的战略。“跨岛”就是走出厦门岛，往岛外大片的土地发展，提出要将提升本岛与拓展海湾相结合、城市转型与经济转型相结合、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凸显城市特色与保护海湾生态相结合。按照“一环数片、众星拱月”的规划，发挥“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优势，加快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转变，把厦门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布局合理、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国际性花园城市。

　　这个发展战略跳出厦门本岛，将规划范围扩展到整个厦门，既符合厦门的实际，突出厦门的特点，又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富有科学性、前瞻性。包括现在我们提出来的“多规合一，建设美丽厦门”，建设“五大发展”示范市，都是在“跨岛发展”战略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

　　提出“跨岛发展”战略的时候，近平同志即将离开福建。他为厦门留下来的这个发展战略，在他离开福建以后，成为厦门市建设的重点。你们现在看到的整个岛外欣欣向荣的景象，包括海沧、集美、翔安、同安，都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发展起来的。通过“跨岛发展”战略，近平同志把厦门提升到整个国家的窗口和龙头作用上来，这是他留给厦门最宝贵的财富。

****采访组：请您详细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指导厦门通过“跨岛发展”，发挥特区的窗口作用和龙头地位的？****

****李秀记：****在2000年1月省人代会上，近平同志作为厦门选出的省九届人大代表，在参加厦门团讨论时，明确提出“要突出厦门特区的窗口作用和龙头地位”。其实，从邓小平同志视察开始，厦门经济特区就是技术、管理、知识、政策的窗口，也是改革开放、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的龙头，是福建发展的龙头。远在近平同志明确提出“窗口作用、龙头地位”之前，他在工作中就一直是这样做的。今年即将召开的金砖会晤，厦门市更是起到了对外政策大窗口的作用，成为国家的窗口。

　　我讲两个例子，一个是厦门会展中心的建设，一个是“9·8洽谈会”。

　　我在厦门任职期间，担任了4任重点项目领导小组组长，包括机场扩建、厦门大桥、人民会堂，还有就是厦门会展中心。会展中心于1998年开始建设，2000年建成。这三年中，近平同志4次到会展中心工地检查指导。其中有一次，我记得是1999年8月，近平同志时任代省长，在他视察会展中心建设时，我向他汇报了会展中心规划设计、施工情况，并提出资金缺口问题。他听完汇报指示说：“厦门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要注重质量，把会展中心建成与国际接轨、国内先进、有厦门地方特色的展览中心。资金缺口问题，我带回省政府研究。”

　　其实我汇报时用的词是“国内一流”，他把“国内一流”改成了“国内先进”。在建设会展中心之前，我带队考察过德国科隆会展中心、意大利米兰会展中心，还有美国的一些会展中心，也考察过北京、上海、大连、昆明的展览中心。当时北京和上海都还没有建新的会展中心，我看过这些之后，断定厦门的会展中心要超过当时北京、上海的展览中心，于是就提出了“国内一流”的说法。近平同志没有批评我，也没有说“你不要提‘国内一流’”，只是改成了“国内先进”。这说明他的站位更高，也更实事求是。后来，省政府从省财政拨款3000万元，帮助解决了厦门会展中心建设的资金缺口问题。

　　第二件事就是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的“9·8洽谈会”。他担任福建省领导和国家领导人期间，多次出席洽谈会。这个洽谈会的由来，近平同志非常清楚。邓小平同志1984年给深圳特区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给珠海特区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给厦门特区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我们自己领会到，与深圳和珠海相比，厦门特区的发展既不够快又不够好。1987年春节过后，很多干部群众反映，希望市里向深圳和珠海学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市委市政府联席会决定派一个代表团，由时任市长邹尔均同志当团长，我（时任市委副书记）当副团长（习近平同志留在厦门主持市政府工作），到广东考察，学习深圳和珠海等地的先进经验。

　　我们去了深圳和珠海，也看了广州黄埔开发区，正好赶上广州在筹办春季广交会。回程的车上，大家就议论起来：广东有个广交会，我们能不能搞个厦交会？但又觉得跟广东一样，走在别人后面，也凸显不了厦门自己的特色。最后就定下来，办成以投资为主的投资贸易洽谈会。

　　之所以把时间定在每年的9月8日，是因为广交会在每年5月和10月，避免与他们冲突。另外，厦门7月、8月份台风多，就剩下9月份比较合适。经过综合考虑，我们在会上一起把洽谈会时间定在每年9月8日。“9·8”，就是“久发”的谐音，取“一直要发展下去”的意思，也表达了对厦门发展的良好愿望。

　　1999年，近平同志作为省领导来到厦门，参加第三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他这样说到：“洽谈会举办13年来，已成为对外招商的全国性窗口，世界各国的客商通过洽谈会看中国的新发展，各国和兄弟省市通过洽谈会看福建和厦门的新变化，因此，办好洽谈会是向国庆五十周年和迎澳门回归的重要献礼，也关系到福建和厦门的对外开放形象。”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是很看重厦门的窗口作用的。国家主办厦门投洽会（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是从1997年开始的，到1999年，刚好第三届。说13年来，是从1987年的“9·8洽谈会”开始计算的。近平同志亲自参与过，所以对洽谈会的情况非常了解。 后来，在近平同志关心下，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如期落成，第四届投洽会就在这里举行。他作为福建省委领导，连续出席了第三、四、五、六届投洽会。2010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同志再次来到投洽会。这一次，他拿起象征会议的“9·8”金钥匙，为投洽会开馆并剪彩，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

****采访组：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给您的著作《从政二十春》写过序，请您讲讲序言背后的故事。****

****李秀记：****我写《从政二十春》这本书是有原因的。记得1982年，我在市委党校学习，时任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同志找我谈话，说组织任命我为副市长，在市委党校学习完直接到市政府报到。我对老书记说：“我当官从政不一定在行，还是想搞工业。”但他说这是组织决定的，让我去报到，然后我就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20年后的2002年，我已经65岁，即将退出领导岗位。在当年团拜会上，我和这位老书记又坐在一起，他建议我写一本回忆录。我考虑了一下，决定把这20年来自己写的稿子有选择地汇编一下，出一本书。老书记认为很好。后来，我就出了这样一本书。因为这本书缘起于陆自奋同志的建议，所以书写好后，我拜托他给我写个序。但老书记说自己写不了序，让我请别人写。当时正好得到一个消息，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了。我心想，我与近平同志共事过，情况他比较了解，我们又有一些缘分，他如果还在福建担任领导的话，我不好去找他，他现在去了浙江，就正合适。于是，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听我说明情况后，很爽快地答应了：“那好啊，你把稿子送来，我马上给你写。”

　　果然，稿子送过去不到一个月，这个序就写好寄回来了。因为近平同志在厦门任职的时候，我和他经常交谈，所以他在写序的时候也很实事求是，写的都是他了解的事情。他在序里写道：“也许从政并非李秀记同志的初衷，但厦门经济特区今日的欣欣向荣和明日的美好前景，足以让他欣慰，足以让他自豪，让他感到这二十年从政人生的充实和荣光。”从这句话可见，他确实很了解我。在序言里，他对我在厦门所做的工作，包括对重点工程的贡献，都作了肯定，这让我非常感动。近平同志当年寄来的序的原稿我一直保存着，寄信的信封我也一直保存着，已经保存了15年。这是一件珍贵的资料，我还要永远保存下去。

****采访组：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很热爱厦门这片热土。在您看来，他的这种厦门情结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秀记：****确实，近平同志有很深的厦门情结。厦门特区成立25周年的时候，我看到厦门电视台采访他的一个报道。他说：“我曾经是一个特区人，厦门是我的第二故乡。”简单的一句话，充分展示了他对厦门的深情和厚爱。

　　他和彭丽媛老师是在厦门结的婚。我想，这应该是他说厦门是他第二故乡的一个原因。还记得他结婚时住的房子，是我曾经住过的旧房子，一共只有62平方米。他们结婚的时候，彭丽媛老师送我一盒《长城谣》磁带，我还一直珍藏着。

　　近平同志的厦门情结，还体现在他对“厦门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提炼上。在一次新闻采访中，近平同志说：“厦门取得的成绩，是一任接一任、一代接一代的接力赛，靠的是厦门建设和改革的参与者，厦门人民群众才是厦门建设的主体，各方面的建设都离不开厦门人民的辛勤努力。”他赞扬厦门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很多精神：陈嘉庚精神、海堤精神、英雄三岛精神、鼓浪屿好八连精神、马塘精神以及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包容并蓄、大气和谐的精神。最后他说：“这些形成了艰苦奋斗、拼搏创新、包容并蓄、大气和谐的厦门精神。”

　　1988年6月离开厦门后，近平同志无论担任宁德地委书记还是福州市委书记，都一直关心着厦门的建设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我每次去福州开会，他都会问起厦门的事情，有时候还特地到我住的宾馆和我长谈，了解厦门的建设和发展情况。

　　近平同志担任省领导后，依然十分关心厦门，每年都有三次以上到厦门检查工作。像刚才讲到的，2000年1月，他强调“要突出厦门特区的窗口作用和龙头地位”；还有2001年2月，他提出“希望厦门的同志要振作精神，增强信心，内聚人心，外树形象，再创特区辉煌”。

　　他当时讲这些话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当时刚好是中央查办厦门特大走私案接近尾声，厦门海关和厦门市有很多干部落马。我当时担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根据当时的情况，2001年8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了一次各级人大代表“回家”活动座谈会，请近平同志回到厦门，同人大代表见见面，给大家鼓鼓士气。我在介绍时说：“省长习近平‘回娘家探亲’，与在厦门的全国和省市人大代表围绕如何加快发展、再创特区辉煌这一主题进行座谈。”在座谈中，近平同志认真听取代表意见后指出：“特大走私案伤了厦门的元气，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中央与省里已讲得很清楚，厦门的成就是主要的，干部的主流是好的。厦门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没有改变，一定要振奋精神，统一思想，扎实工作，再创辉煌。”

　　厦门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一个影响重大的案子，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波折和坎坷。在这个关键时刻，近平同志回到厦门同干部谈话，起到了鼓舞士气、振奋精神、凝聚人心的作用，也充分说明了他对厦门的深厚情谊。

　　2010年9月，近平同志再次来厦门考察调研。那时他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可他仍然像以前在厦门工作时那样，进社区、访港口、看城建，一处一处地认真了解情况，看得很仔细。当时他在领导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还有更高远的目标，要共同努力，把厦门建设得更加美丽、更加富饶、更加繁荣。”

　　近平同志为厦门设定的更高远的目标是什么呢？是更加美丽、更加富饶、更加繁荣。2016年9月16日，近平同志出席在印度果阿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讲话中宣布，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将于2017年9月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厦门的高度信任和关心厚爱，体现了党中央对厦门的战略地位和特区窗口作用的高度重视，为厦门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支点城市、提升厦门国际性现代化水平提供了重大机遇。我们都期待着，厦门将以更加美丽、更加富饶、更加繁荣的海上花园城市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也都期待着，在这样一个崭新的、充满勃勃生机的厦门，再次迎接近平同志“回家”看看。

## **“近平同志提出的‘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很有远见卓识”**

### ——习近平在厦门（二）

**采访对象：朱亚衍，1944年8月生，福建泉州惠安人。1986年前在化工部部属单位工作，1986年调任厦门化工公司经理兼利恒涤纶公司党委书记，1987年12月任厦门市副市长，1990年7月任厦门航空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1993年6月任厦门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1998年1月任福建省副省长，2000年2月任副省长兼厦门市长，2002年7月任省委常委、秘书长，2005年5月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8年退休。**

**采 访 组：沈凌 路也 胥晴**

**采访日期：2017年6月4日**

**采访地点：厦门市朱亚衍家中**

****采访组：朱省长您好！请您介绍一下当年和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朱亚衍：****近平同志是1985年6月来厦门工作的，我是1986年3月调来厦门工作的，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1986年夏天。当时，化工部副部长冯伯华同志来厦门检查工作，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不在厦门，所以市政府办公厅就请近平同志代为接待，我有幸陪同，就有了与他的第一次接触。

　　近平同志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可以用6个字概括：年轻、博学、亲和。当时他只有30岁出头，短短的交谈让我觉得他学识非常渊博，又很有亲和力。

　　那次我们还很有成果，就是把厦门橡胶厂的工程轮胎项目给谈下来了。当时厦门有个工程机械厂，生产工程机械需要用大尺寸轮胎。厦门虽然也有一个橡胶厂，但这个橡胶厂只能生产自行车轮胎和小卡车轮胎，不能生产工程轮胎。这些工程轮胎都是从河南、贵州等地购买的。正是因为这一次见面，近平同志带着我与冯伯华副部长座谈，就把工程轮胎的项目办下来了，可以为厦门的工程机械厂配套生产工程轮胎了。

****采访组：我们知道您曾担任厦航董事长，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关心和支持厦航创建和发展的？****

****朱亚衍：****我是厦航的第三任董事长，厦航能有今天的发展，归功于改革开放，得益于国家民航局以及省市的支持和帮助，倾注着近平同志的心血。从厦航组建到今天，他始终念念不忘厦航的发展。

　　我先讲讲厦航组建的过程。厦门地处东南一隅，如果坐火车、坐轮船，路上花的时间太长，谁还有兴趣到这里来考察和投资？所以，批准厦门成立特区后，大家最着急解决的就是交通问题。几个特区当中，第一个修建机场的是厦门，第一个开办航空公司的也是厦门。1984年，厦门机场通航后，国家民航局和福建省政府商定合作开办航空公司。同年7、8月份，厦门航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由时任福建省副省长张遗同志担任厦航第一任董事长。次年，新组建的厦门航空公司委托国家民航局通过融资，租赁了2架波音737-200型飞机。我们当时没有人才，就交由广州民航管理局代飞。

　　一个航空公司在初创阶段，最难的就是飞机引进和人才引进。引进一架飞机要过五关斩六将，需要层层审批。引进开飞机的飞行员、修飞机的技师、懂航空经营管理的人才也很难。我还没担任董事长的时候，厦航就已从部队的飞行员和飞机维修人员中引进了人才，我相信这肯定有近平同志的心血，因为他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过，一定协助做了不少工作。我担任董事长以后，也找过近平同志帮忙协调引进飞机。1986年10月，厦门航空公司所属飞机从广州转场到厦门，终于由我们自己的机组飞行航班。可以说，厦门航空公司的创建是与近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的。

　　不单单是初创阶段，在厦航随后30年的发展中，近平同志也一直给予关心和指导。1993年，厦航开通福州到深圳的航班，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近平同志亲任首航团团长，赴深圳交流。2000年4月23日，已是福建省长的近平同志专程到厦航和机场指导工作，他说：“厦航之所以口碑好，一是靠改革，二是舍得投入，三是服务规范，四是以人为本。厦航企业路子对，员工素质高，经营效益好，为省市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06年7月22日，厦航杭州分公司成立，此时已是浙江省委书记的近平同志亲自致信祝贺。2013年，近平同志作为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会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我们厦航的一个乘务长有幸参加了会见。这个乘务长对总书记说：“总书记您好，我是厦门航空公司的。”近平同志亲切地说道：“好，回去跟厦航的同志们问好。”近平同志对厦航的关心一直激励着厦航人奋发图强，砥砺奋进。一晃30年过去了。在总书记关心下，厦航发展到今天，已连续盈利30年。在全球民用航空协会评级中，厦航名列中国所有航空公司第一位，和美国西南航空公司被评为同一个级别。

　　2015年9月23日，近平同志访美期间参观波音公司宽体飞机厂，波音公司在厂房门口摆了两架飞机，一架是即将交付国航的波音737，另一架是即将交付厦航的波音787。近平同志在波音公司总共参观不到1个小时，单在厦航这架飞机上就坐了15分钟。他说：“刚才，我参观了即将交付厦门航空公司的这架波音787飞机。在1985年，也就是30年前，我担任厦门市副市长，分管厦门航空公司，参与了它的组建和初创。初创阶段的厦门航空公司，连带厦门机场，都是利用国际贷款发展的，当时也就只有几架飞机。30年过去了，厦门航空公司引进了最先进的波音787飞机，这就是中国民航事业发展的缩影。”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谦虚地说自己“参与了”组建和初创。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2013年、2015年，他对厦门航空公司的建设与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厦航能有今天的发展，当然有厦航员工的努力，更离不开近平同志各个方面的支持。从另一个角度说，厦航今天的发展，没有辜负近平同志的期望。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提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的过程，以及这个战略对厦门发展的深远影响。****

****朱亚衍：****“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是2002年提出的。站在今天的角度回头看10多年前总书记的思路，是十分有战略眼光的。

　　10多年来，为了落实这一战略，厦门市委、市政府采取了多种举措，逐步有力有序推进战略实施。一是调整岛外行政区划，撤销同安县，设同安区和翔安区，加强了对岛外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二是加快连接岛内外交通设施的建设，相继建成翔安隧道、杏林大桥、集美大桥。三是抓紧投建岛外城市次中心，海沧新城、集美新城、同安新城、环东海域新城均初具规模。四是设立火炬园区、工业集中区、两岸新兴产业园区、自贸区，这些区域成为厦门经济强劲发展的新增长点。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的工作交往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朱亚衍：****我讲两件事情吧。第一件事，近平同志很重视农业，“三农”工作是他自己“讨来”的。他1985年到特区工作，那个时候特区建设刚刚开局，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的任务很重。他除了承担市政府给他的分工外，还主动要求分管农业。

　　他当常务副市长以后，分管的工作一共四大块：第一块是农业口，包括农委、农业局、林业局、水电公司、气象台、水产局、乡镇企业公司和木材公司；第二块是大计划口，包括市计划委员会、经济信息中心、物资公司、劳动局、体改委；第三块包括编委、人事局、财政局、税务局、审计局、人民银行和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外汇管理局、保险公司、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第四块是县区政府工作。这四大块工作中，第二块和第三块一般是常务副市长分管的工作。除了这四大块工作，他还联系市人大、市政协。所以你看，他刚来厦门的时候就把“三农”工作讨来分管，当了常务副市长以后继续分管下去。近平同志离开厦门以后，后来的常务副市长都没有再分管农业。有一次我跟他说，农业不应该放在常务副市长这里。他的回答是：“我看到厦门农村这一块比较弱，就主动要求分管。”

　　对分管的“三农”工作，近平同志的特点是“三到”：一是心到。他对农民和农村工作有很深的感情，这个可能和他过去在延川插队、在正定当县委书记的经历有关，是一种心系农村的情结。二是人到。那个时候厦门大部分是农村，湖滨北路对面是晒盐的盐场，根本没几栋房子；还有个军营村，是厦门最后一个通公交车的行政村，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村还是听他给我说的。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走访过大部分农村。三是工作措施到。每到一处，都结合当地实际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推动工作开展。他现在讲话很接地气，扶贫力度这么大，还提出非常切合实际的“精准”两个字，这在他当年厦门、宁德等地的实际工作中都有所体现，是与他丰富而深刻的实际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积累分不开的。

　　第二件让我十几年难以忘怀的事情，是我向近平同志汇报厦门财政上缴比例问题。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1988年4月计划单列市的确立，厦门市从此就能够享受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为了理顺计划单列工作，我们当时一个一个厅、一个一个部委地去沟通。最快谈下来的是交通，1988年厦门机场下放，然后是港口，等这些都陆陆续续定下来后，财政计划单列一直到1993年才最后定下来。从1988年到1993年，一共谈了5年，实际上财政计划单列就是谈两个事情，一个是上缴的基数，再一个是每年递增的比例。

　　到了2001年农历正月十五，下午快要下班前，我得到一个消息，转天习近平省长要听财政厅汇报，准备调整厦门市财政的上缴比例。我知道兹事体大，本着对工作负责任的态度，我一定要在会议前向近平同志汇报我的想法。于是赶快给近平同志打了电话，我说：“我晚上有个会，会议一结束我就赶往福州，请您一定在办公室等我。”他问我什么事，我说很重要，等到了再说。晚上，我就往福州赶，经过莆田的时候正好接近零点，因为是正月十五，从车窗看出去，漫天都是烟花。

　　赶到福州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夜。到了近平同志办公室，他果然在等我。我说：“我听说明天你们有一个讨论厦门财政上缴比例的会，你们能给厦门减轻点负担么？”他笑笑说：“你想得倒好，要增加点负担。”我继续问他：“现在上缴比例已经很高了，财政部门给你说的提高上缴比例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因为全国其他城市，像南京、杭州、广州上缴比例都比厦门还要高。我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就有数了。于是就跟近平同志解释说：“我不否认这些城市上缴比例比我们高。但那些都是副省级城市，并且不是计划单列市。我们厦门是计划单列城市，在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大连这5个计划单列市中，厦门的上缴比例是最高的，就不要再提高了吧。”近平同志长期在基层工作，我这么一说，他很快就明白了。他很爽快地对我说：“老朱，幸亏你今天来了，不然明天会上定了以后就不太好再说了。”

　　这件事情让我感触很深，近平同志当时已经是一省之长，在正月十五的深夜，能在办公室等一个下属，虚怀若谷地听取意见，最后还能采纳意见，确实非常难得。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以后你们还有联系吗？****

****朱亚衍：****我与近平同志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在这么多年的联系中，有一次与他通话让我印象很深。那是2002年11月左右，他已经去浙江任职了，当了几个月的代省长，马上转成书记。一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在浙江习惯不习惯。那一次，我们就在电话里谈了很久。他很念旧，在电话里问我最近工作怎么样，家里老人怎么样。也很关心同事，一个一个点着名问大家的近况。然后我们谈到了厦门工作的点点滴滴。2010年，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同志到福建视察工作，先到福州，然后到宁德，再从宁德坐动车到厦门，把以前在一个班子里工作的同志们都找来坐坐，大家见面都很高兴。近平同志待人很诚恳，不管对待下属还是对待同事都是这样，每次想起30多年前与他共事的经历，想起那次和他的对话交流，我都非常想念他。

## **“制定发展战略是近平同志对厦门的一个全局性贡献 ”**

### ——习近平在厦门（三）

**采访对象：**郑金沐，1936年1月生，福建莆田人。1959年毕业于厦门大学，高级经济师。1969年6月到厦门市计委工作。1983年10月任市计委副主任兼市物价委副主任，1985年7月兼任市体改委委员，1986年8月兼任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主任。后任市体改委副主任、主任，市计委主任。

**采 访 组：**沈凌 路也 胥晴

**采访日期：**2017年6月5日

**采访地点：**厦门宾馆

****采访组：郑主任，习近平同志1985年6月到厦门任副市长，您是市计委副主任。你们是什么时间见的面？****

****郑金沐：****近平同志来厦门当副市长以后，找市政府部委办领导了解情况，第一个找到的人就是我，我感到非常荣幸。当时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我知道他的父亲是习仲勋同志，从情感上非常尊重他。他的办公室在我楼上。我跑到楼上去，他们就跟我介绍说，这是习副市长。近平同志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个子很高，长得很帅，很平易近人，一点也没有架子。

　　那次叫我上去，他要我陪他去工厂调研。我记得他在工厂里也是很热情地和职工们打招呼、问情况，非常随和。

　　后来听陪同他去同安县五峰村（以前是苏区，闹革命的地方）的同志说，村支书请近平同志喝茶，当时山里老百姓用的茶具可没现在这么讲究，上面都积满了茶垢，黑不溜秋的，看起来有点脏。以前有领导下来调研，一坐下来，秘书就把保温杯端过来，喝的都是自己带来的茶水。没想到近平同志毫不犹豫非常自然地拿起杯就喝了起来。这个茶杯一端，他和村支书、和村民的距离也就一下子拉近了。我听了之后很感动。

　　后来我了解到大家对他的评价，跟我第一次接触他的感觉是一样的。我想，这可能跟他在陕北插队，一直跟农民同吃同住打交道有很大关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初到厦门工作，有没有跟您交流过他对厦门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初步印象和判断？****

****郑金沐：****近平同志没有直接跟我讲过他对厦门的最初印象。他倒是公开讲过对厦门的印象，那是庆祝厦门特区成立25周年之际，厦门电视台记者去浙江采访他，他说，1985年中央组织部调他到厦门工作，他是从中央机关到河北，又从河北过来。他刚到厦门包括到福州，和预想的反差很大。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到过福建，总的感觉不像想象中认为的那样开放和先进，特别是从基础设施上看，从市容市貌上看，当时厦门确实是相对比较落后。有很多人到了厦门，感觉特区怎么是这个样子。所以，近平同志说：“在开始的过程中，工作之艰难是可以想象的。”

　　不仅是物质条件的落后，当时还有人说厦门是一个海岛，厦门人的一些思维方式被称为“岛民意识”“海岛意识”。因此，相比别的特区，厦门经济特区的创建工作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那就是观念上的更新。回首厦门经济特区25年走过的不平凡历程，近平同志对内涵丰富的厦门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厦门的人民群众是厦门建设的主体，多年来厦门的建设都离不开厦门人民的辛勤努力。厦门的同志创造了很多精神，最早是陈嘉庚精神，50年代有海堤精神，还有英雄三岛精神、鼓浪屿好八连精神、马塘精神，等等。这些凝聚成了一种艰苦奋斗、拼搏创新的厦门精神。曾几何时，改革开放这样一种东风，全方位的开放，厦门人树立了一种改革开放的厦门精神，这里边有自力更生，这里边有锐意创新，这里边有一种包容并蓄、大气和谐的内涵。厦门也从一个封闭的海防城市，建设成现代化的海上花园，为人所羡慕的一个美丽现代化城市。

****采访组：1985年，习近平同志力促成立厦门经济信息中心，打造宏观经济的“千里眼”。请您谈谈整个建设过程。****

****郑金沐：****近平同志对厦门经济信息中心建设非常重视。根据国家和省里对经济信息管理系统的规范和要求，厦门1984年就开始筹建这样一个信息中心，当时叫计算机站，1985年改为现在这个名称。

　　近平同志对厦门经济信息中心的筹建工作抓得非常紧，一环扣一环地推进。他认为，特区要发展市场经济，参加国际经济大循环，光有机场、码头、通讯设施是不够的，还要打造宏观的“千里眼”，准确及时地掌握国内外经济信息。因此他非常重视市经济信息中心的建设，成立了厦门市经济信息管理领导小组，亲自担任组长，并把经济信息中心建设列为厦门市基础设施八大工程之一。

　　市里委托一家企业设计了总体方案，近平同志组织国内75名计算机和经济学方面的专家来厦门进行论证。要干事就要有人，我们这个信息中心是从计算机站发展起来的，开始只有十几个人。要搞这么大的系统，十几个人干不了。于是市里就批了120人的编制。编制解决了，还要解决办公场所，于是又拨款买了七层楼，一共5040平方米。

　　在近平同志力促之下，市经济信息中心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国家计委信息办非常满意，把厦门经济信息中心列为全国试点单位。到现在，信息中心运行已经30多年了，对推进厦门的信息化、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给厦门解决了“千里眼”的问题。

　　我认为，近平同志当时的考虑是非常超前而又非常周到的。在一般人看来，一个城市能建飞机场就可以了，哪里还能想到要建什么信息中心。别人看来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他却认为势在必行，还把它列为全市八大工程之一。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曾主持起草了“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的调研报告，您是重要的参与者。请您谈谈这件事情。****

****郑金沐：****搞自由港这个设想，最初是省委书记项南同志提出来的。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厦门经济特区，同意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但当时我们这些人对自由港是什么、能发挥什么作用，只知道个大概，认识上很模糊。除了三大政策，即：人员进出自由、资金进出自由、货物进出自由，自由港还有哪些政策、哪些功能，大家都不清楚。这就好比送给你大餐，你都不知道怎么下口。

　　为了研究自由港政策和厦门今后发展问题，1986年8月市委、市政府同意近平同志的建议，决定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由近平同志主抓，我担任办公室主任。他曾带着课题组部分人员到新加坡考察，回来就跟我们商量，“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方案到底怎么做、怎么写。他说：“我们要立足中国的实际、厦门的实际，不能全搬新加坡的模式，更不能搬用香港的模式，可以把它们作为重要参考。”他要求课题组的同志根据厦门的实际情况研究解决厦门自由港发展模式，争取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自由港的路子。根据近平同志的意见，我们经过深入研究，认为厦门发展自由港应该采取“三步走”加“双梯度”的发展模式。

　　什么是“三步走”？就是通过分阶段、分区域逐步扩大自由度。最初特区划定面积才2.5平方公里，后来扩大到全岛。岛内开放度也不太一样，原来那2.5平方公里的开放度高一点，老市区开放度就很低。根据厦门特区现状，划区分三步逐步推进，逐步增加自由港的因素，提高开放的梯度和开放的层次。第一步就是建立保税区。厦门保税区应该是全国最早提出来的。第二步就是以自由贸易区替代保税区。第三步就是有限度地在全岛放开自由港。

　　“双梯度”，就是在三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要保持“双梯度”发展。如果像刷油漆一样，先刷第一遍，等它干了再刷第二遍，一遍遍地来，这样会很慢，所以要搞“双梯度”推进。第一个阶段是保税区和特区双梯度，保税区开放力度大一点。第二个阶段是开放程度比较大但管理比较严格的自贸区和经济特区的双梯度。最后是自贸区和有限度的全岛放开自由港的双梯度。

　　人员进出方面，特别是外国人的进出，近平同志的意见是近期可以采取落地签的办法，远期可以借鉴香港的做法。后来我们也都这样做了。

　　商品进出方面，新加坡之前也是学香港一下子全部放开，那样它自己的工业一下子就会被打垮。但要是封死了，自由港就建不起来，于是它就先搞了保税区，一共建了8个。新加坡本国有600多个产品，它把这些产品排序，哪些是可以竞争赢外国的，那么这一类的外国产品就让它进来，其他产品就放到保税区去，逐步开放。这种做法，既实施了某些自由港的政策，又保护了本国的工业。我们真正在做的时候，资金、人员、商品三个方面的进出，都是用双梯度开发的办法。商品的双梯度开发其实是吸取了新加坡的教训。厦门还有很多老企业，一下子放开是承受不了的。在保税区，外国进口的产品可以实行比较高的开放，特区（非保税区）就逐步参照条件开放，到最后才实行整个厦门岛商品的自由进出。

　　关于资金自由进出，一开始邓小平同志提出，要考虑是不是发行特区货币。中央曾派国家计委宋劭文副主任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同志到香港、深圳考察研究，也到了厦门。他们调研后，感到现在发行特区货币没有条件，也不能采用香港的模式，即“内外兼容”的模式，而只能借鉴新加坡“离岸金融”的模式。“离岸金融”这个概念在全国也是从厦门率先提出来的。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市委、市政府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就是你们的成果吧？****

****郑金沐：****是的，《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就是近平同志抓战略研究办公室的重要成果。而组织制定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是近平同志对厦门一个全局性的贡献。

　　我当时在市计委工作很多年了，一直都是搞“五年计划”、年度计划，从来没搞过什么发展战略，而且特区也很少有人关注发展战略。现在回忆起来，近平同志能提出发展战略这几个字就非常了不起。

　　为什么要搞发展战略？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邓小平同志1984年来厦门视察后，把厦门特区从2.5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130平方公里，而且说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需要组织一帮人来研究。第二个原因，是邓小平同志题字“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那么怎样落实小平同志的要求，把厦门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一点，这个也要深入研究。第三个原因，厦门特区最初是2.5平方公里，当时虽然也叫“特区”，但实际是个“出口加工区”，现在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厦门特区才由出口加工区转为综合性的经济特区。这样一个转变，就意味着要重新谋划。

　　基于这样三个原因，近平同志就建议市委、市政府组织一班人进行研究，成立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就是由此动议而来的。当时我是市计委副主任，兼任战略研究办公室主任。近平同志也不是一开始就叫我负责这个办公室，而是请一些同志来座谈，座谈完之后才跟我说：“老郑，你来抓这个事情。”

　　制定发展战略，我们都没有经验，他就带我们到北京向有关部门和专家请教。我们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就是于光远。到了于老家里，我们非常震惊，不仅客厅里是书，连楼梯上都是书。于老见了我们说：“近平，你又来了！”说明近平同志不是第一次来向于老请教问题了。拜访于老之后，我们来到中国社科院向刘国光副院长和董辅礽所长请教，把我们在厦门搞发展战略的想法向两位经济学家作了汇报，他们都很支持。近平同志对刘国光副院长说：“能不能请您抽个时间到厦门来指导指导？”刘国光说：“我介绍老董的研究所跟你们合作。”于是后来董所长所在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就一直跟我们合作搞自由港研究。

　　拜访了这些名师大家之后，近平同志心里就有谱了，知道怎么来做这件事。他组织了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的专家，还有厦门大学有关院系教研人员，还抽调了市有关部门的实际工作者，总共大约100来人开始做这个研究，围绕对台问题、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建设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这三个基本问题，进行了21个专题的研究。

　　这21个专题都是近平同志亲自审定的，其中有4个是在全国首次提出的。最后一个专题《厦门市城镇体系与生态环境问题》，是近平同志请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专章研究的，很有远见。现在他老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实在厦门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方面的深入思考了。那个时候我们只注重开发，把精力都放在城市建设上，哪里还会考虑什么生态环境问题，但他就考虑得这么长远。历时一年半，我们完成了21个专题的研究，制定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要说这个发展战略到底为厦门解决了哪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11个方面。

　　第一，解决了厦门特区发展模式问题，也就是厦门到底怎么发展。根据专家的研究讨论，邓小平同志说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所以厦门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建成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这应该是厦门的特色，没有这个特色，怎么赢人家？

　　第二，解决了厦门的城市定位问题。厦门应该是现代化国际性的港口风景城市。后来加上“旅游”两个字，变成“现代化国际性的港口风景旅游城市”。

　　第三，解决了厦门产业发展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据此，我们确定厦门要以发展工业为主，兼营商贸、旅游、房地产业。当时有人说厦门要根据自身港口城市的特点搞贸易，但这样就不能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如果只发展商业，没有工业，第三产业将缺乏自己的物质基础；如果只发展工业，不发展贸易也不行，工业也就没有市场。

　　第四，解决了厦门自由港的模式问题。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三步走”方案。

　　第五，解决了特区要发展什么经济的问题。确定厦门特区应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在当时争论比较大，有的专家说要发展商品经济，有的说要发展市场经济，到底应该发展什么经济？其实这两者都是说的要发展市场经济，为什么说意见会不一致呢？这里面有一个故事。《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本书在出版的时候，鹭江出版社的领导找了我，说：“你这本书要出版的话，有几个事情需要根据我们的要求来改。”其中一个，就是要把“发展市场经济”拿掉。这个要是拿掉的话，就麻烦了。我们不搞市场经济，难道还搞计划经济吗？然后我就到厦大去找了跟我一起主编这本书的罗季荣教授，把这个意见跟他说。他说：“要不然这样，就改为发展商品经济。”有的人稿子里按这么改了，有的人没有改，书里的用法就会比较混乱。后来定为“在国家宏观指导下按国际市场价值规律运行的市场经济”。但这个说法，人家听不懂。最后就干脆写成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样大家都能听得懂。

　　第六，确定了厦门的战略重点问题。

　　第七，确定了厦门机构改革的方向问题。我们提出“小政府大社会”，这在全国是首家提出来的。近平同志在厦门抓机构改革工作时，就根据“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撤销掉了8个工业局。这在全国是先行一步的。

　　第八，解决了国有企业的组织制度问题。

　　第九，提出建立特区金融体系。这也是我们在全国第一家提出来的。我们提出要建立一个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地方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多种金融成分并存、分工协作的特区金融体系。

　　第十，解决了资金自由进出问题。在全国首次提出了“离岸金融”。

　　第十一，解决了保护生态环境问题。这就是近平同志加上去的课题。当时他就提出，发展特区经济的同时，一定要防止环境污染，保持生态平衡，为厦门的子孙后代保护和创造一个美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这个发展战略，解答了厦门特区怎么发展的问题，为厦门经济特区发展指明了方向，到现在还具有指导作用。其实，这个发展战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另一个是那21个课题，这些课题覆盖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规划，至今对厦门市制定五年规划还有借鉴作用。

****采访组：厦门在当时四个经济特区中是面积最小的，制定发展战略，很难在短期内体现出效果，为什么习近平同志当时还要牵头做这样一件事情？****

****郑金沐：****当时，研究发展战略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近平同志却一抓到底，毫不松手。他说，作为领导者，既要立足于当前，更要着眼于长远，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画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

　　制定发展战略，重大意义就在于，在厦门经济特区初创的年代，从思考城市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上，梳理特区的各项工作，从一开始就为建设经济特区找准方向，避免大的波折和走上弯路。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要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的指示。现在有些领导都是在任内赶快搞一个事情，成绩一出来，马上就提拔走人了。但近平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就体现出一种甘于做铺垫、甘为后人种树的精神境界，这一点非常了不起。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交往中，有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

****郑金沐：****说起来，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政治意识强。这一点从厦门到中央一直是这样，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不是说他现在当了总书记我们这样讲。近平同志发展经济的理念很开放，但掌握一点，一定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在厦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就跟我们战略办的同志说，我们是搞经济特区，不是搞政治特区，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一定要体现这个，严格把握制定战略发展的方向，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要把厦门建成具有自由港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而且要把这点作为制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写进去，到本世纪末，把厦门建设成具有自由港特征的多功能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

　　二是战略意识强。他在厦门工作期间，组织制定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任福建省长期间，提出厦门应加快实施跨岛发展战略，要做到“四个结合”，即：提升本岛与拓展海湾相结合、城市转型与经济转型相结合、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凸显城市特色与保护海湾生态相结合。这充分体现了近平同志的战略眼光，更体现了他对厦门的关心和了解。

　　三是改革意识强。他在厦门工作期间，抓机构改革，抓物价改革，抓国有工业企业利税分流改革试点，抓金融体制改革。这些改革都比较超前。他抓厦门金融体制改革成效明显，改革方案被选入《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文集，放在了第一篇。这本书的编辑指导委员会，福建省有两个人，一个是省委书记项南，一个是省长胡平。胡平同志当时评价说，近平同志在厦门谈的“金融七条”很有前瞻性，到现在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还是这七条。

　　四是大局意识强。1988年，他抓计划单列，省里对这个事情大体上是支持的，但有些具体问题看法不一致。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和行政管理权的划分有分歧，厦门市凡是高级职称都不能自己评。另外就是指标划转问题，比如资金、物资、粮食指标，我们总是跟省里说，多划一点给我们，就像姑娘要出嫁了要多给点嫁妆一样，因为中央直接划转的指标，是以省里划转的为基数。但省里却说，姑娘出嫁要对父母亲多做贡献啊，少拿一点。在这些方面，省市的看法不一致，近平同志就负责协调工作。他说，大家要从大局出发，从中央的意图出发，从省里的考虑出发，解决这些问题。这些话不是秘书给他写的，是他即席讲的。他一直在强调说：“我们是国家大局中的一颗棋，不能闹独立，要发挥特区的作用，不为难省里。”他懂得换位思考，工作方法非常好。 五是奉献意识强。《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近平同志已经到宁德工作了。我给他打电话，请他当主编，他说让我和罗季荣签字，这本书就可以出版了。他坚持我们三个都当主编。现在没有哪本书是这样的，一般都是一个主编，其他都是副主编。这就是他平时说的“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不在乎名利的奉献精神。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相识多年，您怎么看待他的为人处世？****

****郑金沐：****近平同志非常念情，你对他一分好，他都会非常感激，不会忘记。2010年，近平同志单独接见我们原来在一起工作的十几位同志，每一个人，什么时候跟他认识的，他都能回忆得很清楚。有人说：“您的记忆力真好！”近平同志说：“如果我这都忘记了，那就真老了！”

　　近平同志公私分明。有一次他正在哈尔滨参加会议，市里派我和他参加福建省汇报团，到北京汇报情况。我跟他打电话，问他知不知道这个事情，他说知道，明天早上就能到北京。我又问他要不要给他家里挂个电话，派个车子去接，因为当时厦门的驻京办没有车子，我是跟代表团一起，住在省驻京办。他说不用，让我在省驻京办的公共汽车站等他，果然他是坐公共汽车赶过来的。

　　近平同志很重情义。梁家河的人来找他，所有费用都是他负责，包括医药费也是。有一次，梁家河的老支书来找他，说今年村里的枣子大丰收，想请他帮忙出口。近平同志问一共有多少数量的枣子，老支书说了个数字。近平同志说，这么少不好出口，也就是没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但他话锋一转，问老支书怎么来的，老支书说是村里大家出钱送他来的。于是他二话没说，就给老支书垫付了来回路费，还带他去鼓浪屿看了看。后来，我了解到，他那个月工资又光了。

****采访组：在工作之余，习近平同志和您的交流多吗？主要集中于哪些方面？****

****郑金沐：****工作之外我们都是闲聊，聊些上山下乡和看书的事情。近平同志说他当时上山下乡，满窑洞都是臭虫，晚上都没办法睡觉，第二天还要上工。他听说66粉可以杀臭虫，就把整个床都洒满了66粉，结果差点中毒。

　　这个事情他一讲我就有体会。我1958年参加福建省代表团赴安徽考察，考察完后要坐火车，我怕误点，就从省委宾馆搬到离火车站很近的招待所。我交代服务员让他一定准时叫我，服务员说，不用叫你都会醒的。我当时还不明白，一睡下才发现那儿全是臭虫，一晚上折腾得根本不能睡。

　　他书看得很多，晚上经常看书到凌晨一两点，最晚到凌晨4点。他最怕第二天有什么活动自己迟到了。所以他的闹钟设置了之后，还要再校对一次，保证做到绝对不迟到。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您个人有什么关心的地方吗？****

****郑金沐：****近平同志对我个人非常关心。后来每次来厦门，他都会问我战略办的情况。比起“计委”，近平同志更喜欢叫“战略办”。他说战略办更亲切一点，因为这是他亲自抓的。近平同志开始是分管农业、体改委、战略办、司法，有时他还兼抓税收、财务等大检查工作。任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后，才全面抓计委、财政、税务、金融、物价、人事、编委等工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后，你们还有交往吗？****

****郑金沐：****近平同志离开厦门时，我去为他送行，还有两个人也去送了，就是陈慧瑛夫妇。近平同志走之前问我，宁德怎么样，我说我还没去过宁德，但我听说宁德发展很吃力。第一个是交通不方便；第二个是没有电，有人说“福建福建，不是缺水就是缺电”，宁德更是如此；第三个是没有资源，还不如龙岩，龙岩虽然是山区，但是山里有矿，山上有木头，宁德山里头都是泥巴。

　　到宁德后，他根据那边的情况，抓扶贫，做出了很多成绩，得到干部群众认可。他很求真务实，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不是生搬硬套。后来他到福州当市委书记，听闻我到省里开经济工作会，还特地约我见面，听我对福州的看法和对福州发展的意见。

　　在我心目中，近平同志永远都是那个年轻富有创见、充满活力和干劲、愿意为党的事业不断奋斗的好领导。

## **“习近平同志提倡年轻人要‘自找苦吃’”**

### ——习近平在厦门（十三）

**采访对象：**张宏樑，1964年6月生。1982年9月由石家庄十五中考入厦门大学数学系，1983年9月转入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曾任系团总支副书记，1987年毕业分配到河北省计经委工作。现在一家投资公司供职。

**采 访 组：**石新明 田玉珏 王丽莉 薛宏伟

**采访日期：**2018年6月25日

**采访地点：**北京亚运村张宏樑办公室

****采访组：张宏樑同志，您好！听说习近平同志和您的交往是从一封信开始的。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张宏樑：**说**起来这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1985年11月下旬，我当时正在厦门大学经济系读本科三年级。一天，我收到一封寄自厦门市政府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宏樑同学：****

****你好！我是十一月初从法国回来的，接着就是早出晚归的工作，各方面的来信积案如山，迟迟复信请原谅。****

****可以找个时间聊聊，我也要向你们这些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学习。****

****时间不好定，月底前因有洽谈会晚上都有活动，下个月请你给我来电话，打到政府值班室或找政府办王泰兴联系。****

****我住在图强路2号楼301室，进城时可以碰碰。****

****不赘述。专此布达****

****顺颂****

****学安****

****习近平24/11****

　　我刚看到信的瞬间有点懵，但马上就反应过来了——一个多月前，我给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没想到他会亲笔给我回信。

****采访组：您为什么会给他写信呢？您在信里都说了些什么内容？****

****张宏樑：****说起来很有意思。我一位高中同学的姐夫，是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八一学校的初中同学。他们上学的时候，经常一起交流思想、讨论问题。

　　1985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初涌之时，那时候他们都是30多岁的有志青年，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有很多想法非常需要相互探讨。于是我这位同学的姐夫就给到厦门任职不久的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长信。我放暑假回家时，同学姐夫找到我，让我把那封长信带给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这封信很厚、不好寄，又都是他的心血，怕寄丢了，嘱咐我一定得亲手交到习近平同志手上，还嘱咐我要盯着让他读完，再请习近平同志写个回信说说他的看法。

　　就这样，开学后我就带着这封信回校，没敢寄也不敢直接去送，于是我就给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大意就是想把这封信交给他，同时也很期待能与这位在正定老百姓中口碑很好的年轻领导干部见上一面，汇报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希望得到他的指导。信封上写的是：厦门市政府办公室，习近平同志收。信发出后，压根儿没想到会收到他的亲笔回信。这让我感到很惊喜，也很感动。

****采访组：您当时读了回信，有什么具体感受呢？****

****张宏樑：****我看过信后，有两点强烈感受。一是觉得习近平同志特别谦虚。一位工作非常繁忙的市领导亲自给一个普通大学生回信，信里把有关情况说得很详细，还为回信晚了表达歉意，特别是说要向我们80年代的大学生学习，让我非常感慨、非常感动。二是觉得他为人特别真诚。信中告诉我他住在哪儿、怎么联系，让我有一种被信任和被重视的感觉，距离感一下子消失了，亲近感油然而生。连这封信的信封都是他亲自写的，足见他真心希望与大学生多交流，否则他让秘书打个电话通知我过去就行了，本来是用不着非要亲笔回信的。

****采访组：您是什么时候与习近平同志见面的？当时聊了哪些话题？****

****张宏樑：****我记得很快就和他约了一个周日下午见面。那天，我坐了几站公交车，又步行十多分钟，按照他给我留的地址找到他的宿舍。敲门时，我还有些忐忑不安，是习近平同志亲自给我开的门。我说：“您好！我是厦大经济系的张宏樑。”他说：“宏樑，你好！快请进！”习近平同志笑容可掬、亲切和蔼，标准的普通话，声音带着磁性。我们俩一握手，他就说：“你的手很厚很软啊！”这句话一下子就把我的不安情绪给打消了。

　　习近平同志的宿舍一进门就是客厅，和过道连在一起，很窄很小，就摆了两张沙发和一个茶几。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坐吧。”我说：“这是您同学给您写的信，让我一定盯着您看完。”他接过那封厚厚的信，边笑边说：“这小子，要么不写，要么就写这么厚！”说完就坐下来很认真地看起来。

　　看完信后，他说，信中这些观点有的很好，有些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商榷。厦门是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处在改革开放最前沿，有很多新的做法。我来了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感受和触动，特别是在推进改革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谋划。这样吧，我先简单说几点，你记录，帮我先回个信转达一下，有时间我再正式回信。

　　我记录完后，习近平同志看了看记录稿，点了点头说：“可以！”说完，他又转过脸笑着问：“你是哪里人啊？父母是干什么的呀？”我说：“我是河北石家庄人，父母都在中国科学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工作，都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党员知识分子。”当我提到父亲张尔翼是高级畜牧兽医师的时候，他说：“我对你父亲有印象啊。我在正定当县委书记的时候，请过好几批专家，其中就有你父亲。”他这么一说，一下子把我们两个人的距离拉近了很多。

　　当他得知我刚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还担任了厦门大学经济系团总支副书记后很高兴，说：“好！年轻人就应该要求进步，积极入团入党，利用一切机会锻炼自己。要艰苦朴素，要自找苦吃啊。”

　　临走时，习近平同志说：“我刚来厦门，认识的人也不多。你周末没事欢迎过来聊一聊，我很想了解你们大学生都在学什么、想什么、做什么。”他说，他们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都是有过社会实践经历的，而80年代的大学生不一样，都是校门对校门，基础知识比较牢，但缺乏社会实践锻炼，想法和行为都有很大不同，这方面他想好好地了解一下。他当时说的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年轻人不能认为进了大学就进了保险箱，就等着将来直接分配到机关，一定要多接触社会，补上社会实践这一课。你们虽然读了很多书，但书里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众实践结合，才能把水分挤掉。要给书本上的知识挤挤水，才能得到知识干货。”

****采访组：您怎样理解习近平同志当时提倡青年人要“自找苦吃”？这对您的人生有何影响？****

****张宏樑：****要说对我做人影响深远的，就是习近平同志多次讲到的要“自找苦吃”。他说：“我对自己的首要要求就是自找苦吃。”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人生观。再一个原因应该是梁家河那段下乡经历对他的锻炼成长影响很大，是切身感受，也是肺腑之言。

　　记得后来，他跟我回忆了很多知青时候的事。其中一个就是大冬天下到粪池里起粪，这是当时农村最苦的活。因为冬天粪池里结着冰碴，但也得下去起粪，一方面需要沤粪，再一个粪池快满了，不起出来也装不下。习近平同志对我回忆说，去起粪就得把鞋子脱了，把裤腿挽起来，光着脚跳进去用铁锹一锹一锹往上起，冰碴把腿和脚划出一道道血印子。他当时只有十几岁，个子不够高，身体也不够强壮。起粪的时候弄得满身既有汗水又有粪尿，混在一起，又湿又臭，冷风一吹，全身冰凉。粪池里不仅脏，还散发许多恶臭的有害气体，令人窒息，越到后面越难受，既考验体力也考验毅力。但这个活他干得最多，每次都是第一个主动跳下去抢着干。他在别的地方也提过，下乡要过五关：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劳动关是关键的一步。他说，只有跨过了劳动关，树立了“自找苦吃”的想法，才能砥砺思想，让你的思想更加靠近老百姓，也让老百姓更加信赖你。

　　说实话，当时我对“自找苦吃”这四个字理解得还不深。后来，我特意去了一趟梁家河。当我亲眼看到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插队时建起的全省第一口沼气池，听到当地村民中传颂他在梁家河为民造福的故事，终于体会到青年时的他真的是做过那些最脏最累的活才知道农民最需要的是什么，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感情也才更加深厚；我也真的“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联系群众”，对习近平同志提倡的“自找苦吃”理解得更透了。在后来的人生路上，我时刻提醒自己，有苦吃是机会，要坚持多学多干，多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

****采访组：听说习近平同志还与您的老师和同学们讨论过《资本论》，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张宏樑：****习近平同志很关心我们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经常问我，厦门大学伙食怎么样？同学们能吃得饱、吃得起、吃得好吗？然后问我家里每个月寄多少生活费，都有哪些花费？班上开了什么课？等等。当得知我们系开设《资本论》原著课程时，他还多次与我分享在梁家河阅读《资本论》的情景和感悟。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中国最早翻译《资本论》的学者王亚南先生曾任厦大经济系主任和厦大校长。所以，厦大经济系对《资本论》原著的学习非常重视，把《资本论》三卷原著列为必修课，每学期安排一卷，分三个学期学完。这在当时全国高校经济类本科教学中绝无仅有。我对习近平同志说：“虽然学习《资本论》原著很吃力，但同学们的积极性都很高，收获也很大，再学其他理论课程，特别是西方数理经济学，就很轻松了。”

　　习近平同志听完之后说，你们本科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学原理、读原著是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最佳方式，也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最有效的方式。你们经济系坚持了这么多年，做法很好，对学生的成长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肯定会非常有好处。

　　他接着说，我在下乡的时候就通读过三遍《资本论》，也记了很多本笔记。我读过几个译本的《资本论》，最喜欢的是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内心也很敬佩他！因为王亚南先生不但是翻译家、教育家，还是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理解很通透。不只是翻译《资本论》，王亚南先生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旧中国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刻剖析，发表过一系列很有影响的著作，包括《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我也都读过。

　　后来，习近平同志让我联系学校，专门抽出时间到校参加了以《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实指导意义为题进行的一次小范围座谈。学校的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有幸参与了这次座谈。

　　参加座谈的教师对《资本论》研究水平都很高，某句话在《资本论》哪章哪节哪页，前面讲的什么，后面讲的什么，前后如何结合起来理解等等，都装在脑子里了。跟厦大的老师们座谈《资本论》，要是没读过几遍原著，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坚实的社会实践，还真难以深入交流下去。但习近平同志很早就反复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老师们交流起来深入浅出，得心应手。他说起来既有理有据又生动透彻，因为他有扎实的实践经验，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理解得比我们深刻得多。对习近平同志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对社会的广泛了解，特别他就《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当时特区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谈的几点意见，我相信参加座谈会的青年教师和同学们都会有深刻的印象。

　　记得习近平同志当时还讲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叔本华，以及当时流行的萨特存在主义等等。因为当时我还是个学生，知识不够系统，对习近平同志讲的内容记忆不是很清晰了，但有一点记忆犹新，那就是对一位年轻的市领导能如此全面系统地掌握《资本论》而感到敬佩。

****采访组：您在厦大读书期间，和习近平同志还有哪些交往交流？****

****张宏樑：****我们之间的交流还是比较多的。我经常在周末休息的时候到宿舍去找他，一直到我毕业离开厦门。我还跟着他到厦门的贫困村进行过一次调研。那是1986年初夏的一个周末，习近平同志说：“今天我带你去海边看个贫困村，离你们厦大不远。”那天他没带秘书，让司机开着车直接去了何厝村。

　　何厝村地处厦门海防最前线，与当时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小金门岛隔海相望，最近相距才4000多米，用望远镜就能看得很清楚。当我们的车停到何厝海边的小路时，习近平同志笑着对我说，那边国民党士兵肯定用军用望远镜观察着咱们呢。

　　由于何厝村是海防最前线，很多年来渔民不能自行出海打鱼，生活比较贫苦，与厦门特区经济发展反差很大。习近平同志了解到石斑鱼在香港卖得很贵，也适合在厦门沿海养殖，他有一次到何厝村调研时，就提议何厝村养殖石斑鱼。我们去看的时候已经养成出箱了。记得何厝村支书跟习近平同志汇报，鲜活的石斑鱼出口香港能卖到300多块港币一斤。那个时候港币比人民币的汇率比现在高，村民因为养殖石斑鱼，收入增加不少，经济效益显著。

　　习近平同志听了情况汇报后非常高兴，也非常欣慰，并进一步指出，解决温饱问题只是初步，还要想着产业发展，提出下一步村里要发展对台湾小金门岛的观光旅游业。

　　调研结束时，村支书一定要请我们吃一条石斑鱼，说是让我们尝尝为什么石斑鱼能在香港卖得这么贵。我是第一次吃石斑鱼，感觉特别好吃，或许是因为心情好、价格贵才觉得味道鲜美吧。吃完鱼，习近平同志笑着对村支书说，这条鱼我可不能按香港的价格付钱啊，一是付不起，再说我也没有港币啊，说着掏出工资付了鱼钱。

　　这是我亲眼见证的习近平同志抓扶贫的实例。调研中，他说，我们国家扶贫的任务还很艰巨，一定要关心群众疾苦，扶贫工作要因地制宜，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岛吃岛。村里要发展有本地民俗特色的乡土农家住宿和渔家餐饮，比如全鱼宴。还可以开展对台湾小金门岛的观光旅游，让我们的渔民开着渔船，带着游客，到小金门岛附近，来一个近距离的小金门岛观岛游，回来后再吃上一顿当地风味的渔家宴，住上一晚农家院，游客一定很多。摆脱贫困要长期抓下去，才能见到效果，不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问题是无法向老百姓交代的。

****采访组：我们听说您后来回老家开展社会实践调查，习近平同志还给予了很多支持。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张宏樑：****1986年初，快放寒假的时候我去看他，并告诉他我准备回老家开展社会实践。习近平同志很高兴地对我说，好啊，我支持。他说，旅游业作为正定县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调走的时候才刚刚起步。旅游基础设施初始投入比较大，投资回收期较长，但方向肯定是正确的，你回去专门就正定旅游业的发展搞个调研，回来跟我说说，看看还需要我做哪些工作。

　　我回到石家庄，很快赶到正定联系上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及资料组、信息组的三位同志，这三位同志都是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时的县委办工作人员。我向他们介绍说，习近平同志非常惦记正定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旅游产业和荣国府项目的情况。我准备结合“旅游经济学”课程要求，做一个正定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和展望的实习调查，请你们多帮助。他们三位首先领我到县委办公室资料室，把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时的调研文章、讲话稿和起草的公文都找出来，我一眼就能辨认出那些稿子都是习近平同志亲自起草的，字体方正、遒劲刚毅、一笔一画、力透纸背。我一晚上没睡觉把相关的稿子都认真拜读了一遍。文稿思路非常清晰，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在抓好眼前工作的同时，也长远谋划正定几十年之后的发展。

　　第二天，我向这三位同志了解正定旅游业具体情况。他们三位介绍说，正定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文化古城，1983年习近平同志来正定不久就开始酝酿发展正定的旅游业，恰逢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需要建造一个荣国府，习近平同志就积极争取项目落地正定，并考虑借此机会建成实景，为正定县留下一处永久性的旅游景点。

　　正定历史上是农业大县，一些同志对发展旅游业还有疑问，认为一是没经验、没人才，二是建成了也怕没人来、包袱大。习近平同志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和人们文化生活需求的提高，旅游业肯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这个机会不能错过。他和其他县领导积极做工作，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县委很快作出了兴建荣国府和常山公园的决定，为正定县旅游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短短两三年时间，这些旅游景点的门票收入就快速增长，实现了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两方面的丰收。

　　调研期间，著名京剧演员杨春霞出演的《杜鹃山》正好来正定演出，这在以前的正定县是不可想象的。演出的常山影剧院，也是当年在习近平同志领导和关注下新建起来的。由于观众非常多，我记得我们坐在最后一排观看演出。从这件事就看得出来，正定的文化旅游已经起步了。

　　回到厦门之后我就向习近平同志详细汇报了正定旅游产业发展现状，虽然才起步，但势头很好，用不了几年就会上一个大台阶。他听了很高兴，同时指出，荣国府项目只是一个开始，不能孤立地看，不是只为拍一部《红楼梦》而建荣国府。将来正定旅游业大发展，不能光靠卖荣国府、大佛寺门票，如果这样，人家看一圈就走了，一定要吸引来旅游的客人在正定吃特色餐饮、购土特产品、看当地戏曲，留住一个晚上，只有这样搞旅游产业，人流链、资金链、服务链才能一环扣一环，周转起来，形成旅游文化产业链，才能把石家庄、北京、天津甚至更远的客人吸引来，形成正定特色的文化历史旅游。

　　习近平同志又亲自总结了几条，提笔给他的继任县委书记写了封信，就如何进一步发展正定的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文化产业谈了意见，建议全县同志一定要团结一致，统一思想，紧紧抓住旅游产业不放手，发展成正定县的支柱产业。

　　记得后来习近平同志还跟我说起，继任县委书记收到信后，还特地由上述三位同志中的一位陪同，到厦门看望了习近平同志。

****采访组：在这次社会实践中，您有哪些收获？****

****张宏樑：****这次社会实践对我影响很大，我在校主修的旅游经济学终于在实践中有了思考和应用，特别是正定发展旅游产业的生动实践，习近平同志重视第三产业、重视旅游产业与当地人文相结合的思想，成为我实习论文的核心内容，并受到老师的好评。

　　后来，我发现在习近平同志亲自主持编制的《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专门把旅游作为附属篇，提出来把旅游作为重要的发展方向。

****采访组：我们知道您后来毕业论文的选题也与河北正定有关，是否也受到了习近平同志的影响？****

****张宏樑：****是的。我的大学毕业论文，从选题方向到题目、结论都得到习近平同志的指导甚至亲自修改。

　　1987年初，我请教习近平同志如何确定大学毕业论文方向。我说想去调查了解一下石家庄市造纸厂，当时这个厂的厂长马胜利承包经营的经验正在全国大力推广，就此深入研究一下工业经济。但习近平同志建议我说，你还是回正定农村了解一些情况，研究一下那里的土地如何集中的问题吧。

　　习近平同志说，根据他在正定和在厦门工作的情况看，农业集约化是农业机械化的前提，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农民脱贫增收的必由之路。农业没有集约化就发展不了农业的现代化，农民就摆脱不了土地的桎梏，农村发展不了第三产业，也不能实现半城郊化、城镇化，不能实现农民增收。他希望我做个调查，也顺便带给他一些正定农村的信息和情况。

　　原来，习近平同志在1984年就提出正定县要走“半城郊型”经济的发展路子。这是一个介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之间的中间型经济。基于正定紧邻石家庄的实际，习近平同志提出二十字发展方针，即“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这就需要把农村土地集约化，把闲置的劳动力转化到为城市服务的第三产业中来。当我在正定做了初步调查和了解后，我才明白了为什么习近平同志让我来正定了解土地集约化经营问题，因为他还深深惦记着正定的发展，惦记着农民的收入，惦记着探索城郊县经济发展的新路。

　　这个选题得到了我的指导教师的肯定。结合所学习的理论知识，我就正定县土地现状、土地集约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实现的步骤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和探讨，写出了关于正定土地集约化的毕业论文初稿，题目是《浅析我国农村土地集中问题——从河北正定县土地如何实现土地集约化谈起》。我把论文初稿送给习近平同志审看，他看后表示基本认可，说：“你作为一个快出校门的大学生，情况了解得不错，也具备基本的理论知识，但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实事求是，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分步办法。”他指出，在现有的土地所有制、承包制和户籍制度下，如何促进土地集中，这不是简单的课题，不能脱离实际想当然，不能一蹴而就靠理论。所以，你这个论文的题目应该改为“从土地集中‘难’”谈起为好，提出一些解决土地集中难的分步办法。他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于是，我将毕业论文题目改成《浅析我国农业土地集中问题——从河北正定县土地集中难谈起》。

　　最终，我的毕业论文取得90分的高分，我的指导老师给我的评语是：“本文以河北省正定县的实际情况为依据，论述我国农业土地集中的意义、条件、途径及其存在的问题，内容体系新颖，理论联系实际，论述由浅入深，有较强针对性，有独立见解，对我国农村经济实践有一定指导意义。”我知道，能得到这样的肯定，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习近平同志的悉心指导，他的很多重要观点给我的论文大大加分添彩。

　　从指导我论文这件小事就能看出，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他任福建省长时，还特意请我的这位指导老师到省政府作农业经济专题讲座。后来，习近平同志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中也深刻指出，中国农村市场化改革是建立和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取向，是突破农村改革和发展瓶颈制约、开创农村改革和发展新局面的重大举措，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

　　习近平同志也一直非常关心正定的发展。1993年3月，习近平同志到河北考察，他把我叫到他住的酒店，让我陪他一起回了一趟正定。记得还跟三位县委办的同志见了面，习近平同志对那些一起工作过的干部都很挂念，很有感情。

****采访组：在您大学毕业回石家庄工作前，习近平同志都和您说了什么？****

****张宏樑：****1987年7月9日，我毕业回石家庄的前一天晚上，去跟习近平同志道别，请教他还有什么需要指导和嘱咐的。习近平同志对我说，你工作后一定要下基层工作，不能总待在上级机关，不要把基层当大车店，至少要踏踏实实干上两三年，一个事情踏踏实实干上几年才有可能出成果。“不要把基层当大车店”，是他很有特点的一个说法。他说，我在梁家河的7年，正好是你们上高中、上大学加在一起的时间。我上的是梁家河的高中、梁家河的大学。上了这个高中和大学，对老百姓才会有很深的感情。你们一定要下基层，才能培养出对老百姓的感情，才能提高自己，干出实事，做出实效。

　　临行前，我对他说：“我的毕业纪念册，您给题个字吧。”他高兴地说：“好啊，我先看看。”他拿着我的毕业纪念册一页一页地翻，仔细看了每个老师和同学的毕业留言。当他看到我自己的留言是：“沉下去，绝不沉沦；浮上来，更不轻浮。请让自然规律做我们的动力吧，用我们的年轻做最大的资本。”他抬眼看了看我，点了点头，似乎还算满意，然后他说：“我给你写八个字吧。”

　　他拿起平时常用的圆珠笔，写下了“志存高远，行循自然”八个字，题上了他的名字和时间。我感觉，习近平同志书写的时候很用力，写完之后，他说：“这八个字，你要好好体会，立志的同时，要务实、要实干。”

　　写完后，他又拿过我的笔记本，在上面写了十几个同志的名字和电话，让我回石家庄后代他去看望，其中包括吕玉兰等同志。他说：“这些同志都帮助过我，你回河北代表我去看望他们，谢谢他们，也把他们的情况写信告诉我。”

　　那天习近平同志还说，你既然回了石家庄，在把学习工作安排好的同时，抓紧把婚结了，一个是让你女朋友和她家里放心，再一个你要是25岁之前结了婚，25岁就有了孩子，这样你们年轻，精力旺盛，很轻松就把孩子带大了，对晨霞的身体影响也小。特别是你到了50岁时，正是最有经验和精力干事业的时候，孩子25岁大学毕业了，没有任何负担，你们俩都可以专心继续干事业，而且还形成了影响教育下一代人的良性循环。

　　他接着说，其实我们社会的传承也是这个道理，将来你们年轻人走向社会，在工作中要多向大你们十几二十岁的人学习，他们有经验有能力，能够带领你们更快成长。将来你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40多岁，也要重视对小你们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的培养，这样就形成三代人上下传承，承前启后，绵延不绝的奋斗过程。

****采访组：请谈谈您对习近平同志“勤俭持家，低调做人”的家风的感受。****

****张宏樑：****习近平同志是个非常朴实的人，在厦门我们接触的这段时间里，他基本上都是天天走路或骑自行车上下班。按说他是可以有公车的。他对身边人也关怀备至。记得1986年冬天，天气特别冷，我寒假回石家庄过春节，习近平同志把他的军大衣借给我。他说：“你坐火车，还要倒车，穿军大衣会暖和些，我穿夹大衣就够了。”

　　三天后，我到他北京的家里把军大衣还给了他。在他家，我感受到了“勤俭持家，低调做人”的优良家风。很幸运的是，那天我还见到了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习近平同志特意请习老来到客厅，向老人家介绍我：“这是我在厦门认识的小朋友。”习老握着我的手说：“好啊，他还年轻，你们要多帮帮他啊。”习老那天上身穿红色中式对襟棉袄，下身穿深蓝色西裤，满面红光，精神矍铄。

　　记得那天家里还有他的弟弟习远平。习近平同志介绍说，你们俩年龄接近，更能聊到一块。习远平当时正在创业，他开玩笑说他的项目很有前途，让我毕业后跟他去干，我说还是想回河北政府机关工作。习近平同志听了我们的对话，严肃地对我们说：“宏樑毕业后好好去基层锻炼，别想马上去什么大公司发财的事；远平干公司就好好干，别想回政府机关，做生意也别想着跟政府掺和。总的一句话，想发财就别想当官，想当官就别想发财，别想两全其美，‘鱼和熊掌不可得兼’，两个都想得，那是不可能的，那会害了你们自己。”这段话对我触动很大，像刻在我脑子里一样，至今记忆犹新。

　　那次在习家，我感到那么高层的国家领导人，家庭装饰摆设等与普通人家别无二致，大门上贴了春联，家里充满其乐融融、喜气洋洋的气氛，透出浓浓的年味。院子里堆着北方人过冬常备的白菜、萝卜和大葱，客厅也只摆着几盘花生、核桃和糖果。习近平同志让我坐火车帮他拎回来的一兜子漳州芦柑，就是最好的时令年货了。

　　习近平同志出身高干家庭，但做人非常低调，心里总想着为百姓做事。在交谈中，他时常说，咱们为老百姓干事，不能有只追求自己生活快乐的思想。大学生也一定要丢掉这种思想，扑下身子为老百姓工作。他曾经多次跟我说：“我自己把‘自找苦吃、为老百姓做事’作为第一信念。尽管会有很多坎坷，每天都经历不同的挑战，除非身体不行了，除非不让我干了，只要没有这两种情况，我都会坚定不移走下去。”

　　习近平同志做事非常认真，也很注重细节。他说，在军委工作时，首长下午要去一个地方，我对北京路熟，也知道怎么好走，但仍然要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请司机跟我跑一趟，怕修路或改路了，耽误首长时间，亲自跑一趟才放心，这是细节。你做人做事都得有这个细节意识。

****采访组：看来您在厦门和习近平同志的交流还是很多的，您还能否回忆一些有趣的生活片断？****

****张宏樑：****好！我那时候经常利用周末去他宿舍找他，一直到我毕业离开厦门。习近平同志是北方人，特别喜欢吃饺子，厦门的餐馆没有卖饺子的，只有一种类似饺子的“扁食”，但味道很不一样。有空的时候，我们就在他宿舍，自己动手包。他准备大白菜、猪肉，我就负责剁馅儿、调馅儿、擀皮儿，然后大家一起包饺子。他吃得特别香，说：“还是北方的饺子好吃！可比吃‘扁食’过瘾多了！”还夸我馅儿调得不错。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1986年中秋节前的一天，习近平同志骑着自行车，带着两盒月饼到厦大学生宿舍芙蓉二找我，说是单位发的，一个人也吃不了，请同学们吃月饼，一起过节。同学们都远离父母家乡，看着有这么大一个领导自己带来月饼给我们过节，都非常开心，都说没想到堂堂一个副市长能像大哥哥一样亲切。

****采访组：我们相信，与习近平同志的那段交往是您不可多得的经历。您讲的这些事情，您所了解的习近平同志当时的那些思想，对当代青年人特别是大学生有哪些指导意义呢？****

****张宏樑：****接受你们的采访，回忆起很多30多年前的珍贵往事，对我自己的灵魂也是一次洗礼。因为这些亲身经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我今天理解得就更深入一些。

　　我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划时代的伟大思想，主要由四重维度组成：从时间上讲，习近平同志几十年来艰苦实践，一以贯之；从广度上讲，他亲身经历了中国大多数阶层和行业，不屈不挠，上下求索；从高度上讲，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作出新贡献；从传承上讲，他传承红色基因，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培养指导和中外历史先进文化的熏陶。伟大思想从四个维度与中国实际情况牢固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包容力、指引力和传承力。

　　习近平同志一直以来非常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今天我回想起30多年前和习近平同志的交往经历，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场难得的心灵洗礼，是一次珍贵的党性教育。他的谆谆教诲和嘱托就像春雨沁人心脾，像清泉洗涤人性，像春风唤醒绿叶，像闪电激荡尘埃，对当代大学生肯定会有重大指导意义。我坚信，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一代中国青年，一定能够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变为现实，一定能够成为合格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